

馬驥伸
黃肇珩



九十，是人生中的一個新高峰。

回首掃瞄，多少甘苦樂憂、起伏揚挫，相對大自然與人類歷史，固然平淡，對我們自己卻不算平庸。諸般一切，都有個中滋味，懷憶咀嚼，有溫馨、有甜蜜、有超脫、有釋放……

朝向未來，以平常心在平靜中體會平順、平穩的生活旋律，在不平凡的自然人文下，擷摘小小平凡的悅愉情趣，尤其是夫妻牽手邁過六十年共同的生涯，彌足珍貴。



肇 麟
沂 伸



輯一

人生

人生三重奏

有人把人生置於兩極之間——生與死。

有人視人生為浩邈無垠，難以窺其萬一。

對人生的看法，胥由個人不同的參悟；而且要有相當主客觀經驗與知識為基礎。

我習慣於將人生分從三個層面去省視：生存；生活；生命。

生存著重理性與知覺，從科技、社會、法律、經濟…等角度出發，探求如何能健康、安定、無憂懼地生存於大自然與人文的時空中。

生活貴在感性與體會，浸潤在藝術、文化……的滋養中，探求如何能豐富、充實、自由、愉悅地生活在自我與人際雙域。

生命崇尚悟性與思維，遨遊哲學、科學與宗教的洄流，探求如何能參透人、我、宇宙之間的對應與和諧，讚賞個人與群体的生命。

生存，生活，生命；各為人生的主要基柱，交織呈現人生的縱橫面，猶如三種主奏的樂器與演奏者，以三重奏形式交迭平衡演出。

人生的三重奏，是由自己譜曲，而與人和諧的共同演奏；尋求以融洽的和音，展現純淨優美的和聲，凝溢出美妙的生之奏鳴。

○ 人生・樂曲

如果把人生比擬作音樂。

人生可以是交響曲，也可以是一首小品；交響曲氣象萬千，多采多姿，小品也自有其優雅、變換。無論是那一種，都可豐富、激盪大眾生活，也充實、涵泳了創作樂曲者自己。

音樂必須付諸演奏或歌唱。交響曲演奏要有規模龐大的管弦樂團，得有相當的人脈和濟力支援；小品則只要自己能獨唱或演奏一種樂器，就可自得其樂。

人生的樂曲，應由自己創作。要寫交響曲，還是小品，決定在你自己。

當然，交響曲更輝煌，音響豐厚，變化強烈，陶醉其中，不可一世；可是，經營與協調一個大交響樂團，也有相對的承擔與付出。

小品，自彈自唱，自由自在，瀟灑曼妙，甘賞會心；不過你得安於淡泊、平靜。

如何抉擇，得費一番思量；卻也可以豪氣地放開手來，都試它一試。

○ 人生什錦

生命是福緣，惜福，修福。

生命無定數，隨緣，修緣。

生活如畫紙，若能掌握畫筆，或工筆、或寫意、或潑墨、或彩色繽紛、或淡描淺勾，揮灑由心。

心情譬之氣溫，境寒多方求暖，境熱洒把涼水，調適在己。情緒結構複雜不亞於地層，小有微震將疏鬆處落實彌平，可避斷層大震。

人生道上波折起伏，心靈旅程晴雨不定。事業、個人經濟、生活起居，時有起落，落而能起，便是大福。



輯二

人生

人+生=人生

和宇宙一樣，人與生是並存的。

與我

○ 我

沒有我，人生對我不存在。
在浩瀚的宇宙與無量數的人生中，
我的出現，只是須彌中一芥子耳。
對我，我的出現，意義無窮。

○ 我

來自點滴細胞
歸為片粒骨灰分子
大不過兩公尺身軀
長不過百餘年生命
個人的生存與無限宇宙難相對比
但他或她 也都真食存在過

存在的意義之一 是有感知的對象
這是人與生命的本質
就個人說 無我 一切等於不存在
我記憶 我感知 對我是存在

我關懷 我感受 我經歷的一切
都是有意義的存在

2021.6.5 晨起記於華友

God: you never owned anything

Man: then what was mine?

God: your moments?

Every moment you lived was yours

Life is just a moment

生命只是一瞬之間

Live it

活在當下

Love it

愛在當下

Enjoy it

享受當下

2021.6.7 珩錄自 line

我 · 星

遙對低空那惟一綻出光芒的星粒

我與他獨對

此刻另有多少人也在凝視他

千百年來曾有多少人也在若此時刻注視著他

在現此我的時空中 我和他是各自孤獨的

環顧周遭人間

回溯千百年人世

我和他或許不是孤獨的

2003.8.23

在 berkeley 中珩住宅早餐小室
面對金門大橋上空惟一星粒有感



輯二 我

○他筆下的我

由於在新聞界工作了幾年，大家知道了她，也漸漸知道有一個她的我，也因此被找上要我寫我的她。

但是如何寫法呢？不宜褒也無可貶，還是只寫些平常的事吧！

她當記者的一面，我比別人（包括同業和被採訪的對象）看到的還少。不過，我常會被指定做她特稿的第一個讀者，也常在自己的工作中被她提出的問題打斷。我偶爾看到她花幾十分鐘去構思一篇特稿的「起頭」，也常看到她把一疊疊複寫了好幾份的稿紙丟進字紙簍裡，上面都是她寫了而覺得不滿意的稿子——她很少打草稿，卻常常扔換寫好了的稿子。

每當她發出了一篇特稿，第二天早晨我就悄悄地在家裡、鄰居、附近的店裡查遍了所有報紙。她明知我的行動卻不先發問，等我慢慢吞吞地把刊登她特稿的報紙、從銷路較少的幾家報到銷路大的幾家報，然後她笑了。

做為一個女人！她也常誇耀自己的得意之筆，炫道別人對她的面諛之詞；也會稍苛地批評路上所見的漂亮女人。但這一切常只限於對我這一個專設的聽眾。

有了她，我可能比別人少了一些：西部影片和間諜片、太太親手燒的菜，和剛剛嚴令肥而不許再吃的糖果……。但是，我認為值得。

婚前婚後十來年的了解，我想寫的她當然不止這一點點。這一次，就寫這麼多吧！

原文刊於「文化一周」118 期 1968.2.24

（肇珩時在文大新聞系兼課，我以師丈身分應邀寫下此文，原題「我的記者太太」）

○又一

多年來寫文章，不寫自傳，少談家人；這次談肇珩，是二十五年來的又一次。

上次寫肇珩，我就說過：寫家人最難，說好說壞，都有難處；寫自己的另一半，難上加難。

不過，肇珩多年來一直寫人，近年來也偶爾出現在別人筆下，她一向堅持下筆無虛言，有些可以保留不寫，寫出來的力求字字真實，如有褒貶必須出自衷心。秉此原則，她對我的比下直言，尚能容忍。

人人都有長處、短處，也都有強弱兩面。

觀察敏銳、筆鋒犀利、理想主義、有所執著，是肇珩記者生涯中所展現的，在過去那樣的威權時代，她也常為理念之爭而衝撞、抗辯，多少次我暗地替她捏把冷汗，很僥倖她竟能險險地度過一關又一關。

處事果斷明快，敢作敢當，如她名字常被誤為男生一樣，突破因性別而起的差異觀。事事想求完美，使她時常陷入自我的壓力障。我常勸她更灑脫、看得開些，說時她或許會點頭，過後她仍不易自拔。

她在工作上的一面，我反倒是長期的旁觀者，所認知的位置和角度因而不同於別人。

如肇珩曾公開表達的：一個女性，在工作時要忘記自己的性別，回到家裡不要忘記自己是女人。在家裡，我們熟悉的是黃肇珩女性的部分。

她對家人與家庭的細心、投入，不因在外工作的負荷而有多少簡減損。愛整潔、講條理，關懷家人的生活起居，毫不鬆懈。孩子幼小時的課業，多年來家中的地板和洗衣機，都是她份內的專責，包括丈夫的頭髮過長，也是她的督導項目。

我家有四個陽台，花架上和大小花盆裡許多不同品種的花草，是肇珩情緒上新陳代謝的小天地。她細心地培養灌溉，不僅用清水和花肥，還有更多的愛。

母之愛，妻之情，我和兒子、女兒，深深領略，從不匱乏。

在外面的堅強，終須有舒緩的空間，連續多少小時，甚至多少天，持續的工作壓力、人事困擾、輿論臧否；她會煩惱、焦慮難眠、情緒低落……一如常人。偶爾疲憊至極，所顯現的惶惑、消沉，印證了常言所說：人終是血肉之軀、感情的動物。

關懷形象，如同她關懷自己的儀容，對外界的反應、批評，相當敏感。我對她服飾、髮型的建議，她很知旁觀者清，虛心接受；但在處事、寫文章、探討專業問題時，她自有主見，我的批評，常會招致反駁、抗辯。

三十多年，憑自我奮鬥，專注投入，卻也大致順遂的成長之路，使肇珩較難忍受挫折、打擊。當她得意歡欣之際，我偶會洒一點涼水，讓她降一點溫度；當時，她或許稍有不豫，久後她會了解接受，甚至不太露骨地表示謝意。

有時候，我覺得她在家裡比在外面更能克制自己、可能是對外面的一切，她抱定合則留、不合則去的心態；對這個家，她從無捨去之意。當然，這個家裡，又有誰還忍心讓她委屈呢。



從小我就立志當老師。好奇、叛逆，填臺灣師範大學志願，我捨熱門教育系，選新成立的社會教育系。

我的人生跑道，就這樣由教師，轉向中央通訊社記者、國內新聞部主任，被推上中華日報總社長，莫名其妙調到正中書局總經理，又接到「御旨」，去選監察委員。

每一條跑道都不是我主動的，也不是我的選擇。但是，我一旦接受了，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十大傑出女青年，肯定了新聞工作和美滿家庭的優良表現；國家文藝獎，嘉勉我寫作的嚴謹。我很幸運，應邀在大學兼課，圓了當老師的夢。

我感恩！

2015

她筆下的我

我們結婚三十多年，生活在一起的日子超過了一萬三千天，時間，溶合了兩人間的許多習慣、喜好，甚至語言和思考的模式。我們都關懷人生、熱愛人生，但是對人生仍有著不同的看法和執著。

「人生三重奏」是驥伸選自專欄的一百篇短文，每一篇我都讀過，其中大部分我是第一個讀者。儘管全書分為十輯，但都繞著「人生」這個主題，從不同生活面切入，平平實實、清清順順地敘述，引喻、剖析、詮釋，沒有滔滔高論，沒有八股說教，也不咄咄逼人，卻蘊含哲理。有時候我覺得缺乏「火藥」味，驥伸的解釋：理不必說得那麼透澈，流點空間讓讀者去體會、去思考、去透發出智慧的火花。他重視啟發和尊重他人。

驥伸喜歡音樂，他長把人生比擬作音樂。他說：「人生的樂曲，應由自己創作，要奏交響曲還是小品，決定在你自己。」交響樂，氣概萬千、多采多姿，但要有承擔、付出；小品，瀟灑曼妙，甘賞會心，不過你要安於淡泊、平靜。驥伸性近「小品」，但他強調：人、我、宇宙之間的對應與和諧。

我們兩個人都不迷信命運，也不全盤倚賴天命。但是，我相信一個人一生中有一種冥冥的安排，他卻認為這種安排是來自機率。我們常常談論這個話題，到今日仍然各執「主見」。這個話題入了

他的「人生的砒碼」，他提醒把一切信託於天命的人們：許多人去探知天命，多半都發現天機難測。與其信賴生命中不能掌握的天命，不如操控自己增減的「人生砒碼」。他說：知道運用人生砒碼，懂得操控人生砒碼，不論你是否信託天命，都比較能夠掌握生活和生存競爭中的平衡，進而平和、平順。

「在生活當中，給自己留點空隙！」這是驥伸的「生活空間論」，他常為我製造空隙，讓我排開壓力，享受生活情趣。他說：

「享受情趣，其實是對自己的一點點放縱，人生不可在大事大節上放任，卻可隨時在小情趣上，恣意放鬆自己，是一種調劑，更是一大享受。」他不但談人生情趣，更懂得讓別人分享他的生活情趣：偶爾蒐集一些喜愛的小玩意兒，時常享受一杯特別調製的咖啡，給陌生人或孤獨者的一點關懷與安慰，勸服老友暫時丟開手邊的事務，一起促膝把杯樂敘當年……。我很佩服也很羨慕他，在那麼多樣、忙碌工作中，調適自如。我從未聽他唉聲嘆氣，或是抱怨工作太忙，事情太繁。他總是在「忙」與「閒」之間遨遊自在。

人生有許多面向，每個人的選擇和面對都不一定相似。這一百篇人生奏鳴，是驥伸主客觀經驗和知識的體現，也是他對人生的參悟！

原文是為驥伸「人生三重奏」作序，題為「分享」

1997.8

記憶中，我的童年極短；至少，八歲以後，我離開童年。

似乎童年開始有自我意識，我就不喜歡童話和神話，雖然讀過不少。

閱讀方面，我童年後期是在三國演義、水滸傳……長大的，當然早期是連環圖畫或者是為少年閱讀而改寫的。

不過，我大約八九歲已能看原著了，也擴大範圍包括王度盧的「劍氣珠光」、白羽的「十二金錢鏢」和外國的中譯本「福爾摩斯」、「亞森羅蘋」和大仲馬的「俠隱記」。也包括了三十年代左右的「阿Q正傳」、郭沫若的「牧羊哀話」，也許已經加入了蔣光慈的攻擊資產階級的作品。

父親是北京師範大學數學兼音樂輔系高材生，在青島排名低第一的太平路小學當校長，卻對我這長子「揠苗助長」，剛過四歲就塞進幼稚園（當時幼稚園並無大中小班之分，下一年就是一年級），小一就認識 abc 和一些單字，他幼時私塾出身，我很早就背古詩也接觸文言文。他的數學和音樂領域也不會放過我，家裡教的數學遠超學校（直到初二一直零領先同學，我曾向數學超人的中珮誇耀我的代數從未拿過 99 分，她諷笑：最多 98 分）；小一時家裡已有了風琴、依稀記得卻曾練過 byer，一年後開始逃難，其後連父親也與琴絕緣了。

抗戰開始後，我對貧窮和戰爭有了親歷的體認。雖然，也接受過別人的關懷和接濟；但總體印象較強烈的是：戰亂使人多傾向人性的負面，貧窮的困窘、逃奔的恐怖、生人的不可信……。

戰亂中，我的學校教育同樣混亂，小二剛完，七七事變爆發，從此直到初二，我歷經十多個市鎮、十多個學校，斷斷續續，沒完整在一個學校讀過一個學年。

十二歲初一棍第二學期尚未結束，從浙江金華回到上海，因家庭困窘至極，我斷學打工，先在上海南市民眾教育館當了幾個月臨時工（那時似乎無所謂童工問題），後來轉到父親友人一家公司當練習生，工作不僅接電話、送茶……，還常拎了一大袋散鈔送存銀行。

於是，我跳過少年，近於成人了。

○都是名字惹的「禍」

儘管難唸難寫，我還是喜歡。

黃肇珩，這個既難唸又難寫的名字，帶給我許多困擾，也留下許多有趣的回憶。

「肇」，是我們黃家這一代的排行，「珩」是父親根據算命先生批的「八字」，金，木，水，火，土「五行」全，可以不必拘於在名字加上任何偏旁，以資平衡。於是，父親為我「取了「珩」」。他服務海軍，經年隨軍艦海上巡弋，難得在家。

福州話的「珩」與「行」，「宏」，「衡」是同音。上小學第一天，我被寫成「黃肇宏」，編到男生班；然後改為「黃肇衡」，直到小學六年級，才正名「黃肇珩」，但是困擾仍不斷。

在我求學過程中，老師第一次點名，能唸對我名字的，我就很佩服，尤其是「珩」。

為了解除老師的困窘，通常我會在老師猶豫時，站了起來自動報出名字，老師啊了一聲：你是女生！

大師收留了我

「珩」唸「ㄏㄨㄥˊ」，解同「璜」。根據辭典解釋：古人佩掛在身上的玉，半圓形，在上的叫「珩」，在下的叫「璜」。除了表示玉的形狀外，它不是常用字。

名作家林語堂博士主編《現代林語堂漢英詞典》時，指著「珩」對我說：這個字實在沒有什麼用，因為你叫「黃肇珩」，我還是把它收進字典裡去。我頑皮說：「謝謝大師收留了我。」我是這本詞典的中文編輯之一。

許多人接過我的名片，總會指著「珩」問：這個字怎麼唸。名女作家林海音女士建議我在旁邊加上注音符號。她寫給我的信，在「珩」的旁邊就加註「ㄏㄨㄥˊ」提醒我她的建議。我收到的信件，邀請函，請帖中，經常把「珩」寫成「衍」的佔最多數，其次有「衡」、「桁」，「橫」，還有一些奇奇怪怪自創的字，如果要寫出來，恐怕要造字了！

當了記者，經常要在電話中向被訪問人或政府官員，主管通報姓名，這時候，連「肇」字，都難說得清楚，講得明白。有一次，我正試著用多種方法解釋，對方仍不清楚時，坐在一旁的採訪主任彭清先生傳來一句話：告訴他汽車肇事的「肇」。果然奏效，通了，於是我習以沿用。

一九六八年十月，旅美語言學家趙元任博士回國訪問，透過林語堂博士推介，他答應接受我的獨家專訪。我在電話中也如法炮製報上我的名字，他很訝異問我：你怎麼這樣解釋「肇」字？我說，這樣大家才聽得懂。他哈哈大笑，我尷尬的無地自容，還好他看不見。

見面握手時，趙元任博士的第一句話「啊！你就是汽車肇事的黃肇珩。」引來在場一群學者的哄堂，我只好靦腆自我解嘲。「不

是人人都像趙博士這麼有學問。」無疑的，「汽車肇事」的黃肇珩，留給這位語言大師深刻的印象。一九七〇年，我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訪問美國時，在舊金山拜訪趙博士，他仍記得這件事。

李遠哲的合理解釋

監察院第二屆監察委員於民國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就職，二十九位委員中，有三位女性，有趣的是，她們的名字，都相當男性化：林孟貴、王清峰、黃肇珩，更巧的是男委員中，有一位傅美華。在某些場合，我們常會被誤認為傅美華。

監察院各委員會，每年都會安排到相關中央部會，機關巡察。有一年，教育委員會訪問中央研究院，剛接任不久的李遠哲院長，領著我們步上講台，他對著桌上的名牌，很客氣請我就座，我正在納悶他怎麼這麼快就記得我的名字，一看是「傅美華委員」。李院長反應很快，作了合理解釋：今天來的七位委員中，只有一位女性，應該是「美華」，引來一陣愉快的笑聲，也沖淡了嚴肅的氣氛。

家裡電話鈴聲響了，外子接聽，常被問到：「是黃公館嗎？」他總是很和氣地回答：「是！」如果再問：「黃先生在家嗎？」他就直接交給我這位「黃先生」。

有一次，是我接的電話，對方聽到是女性聲音，繼續問「黃先生在家嗎？」我反問：「你找哪一位黃先生？」他說：「我找黃肇珩先生。」我緩緩地告訴他：「我就是黃肇珩。」對方很窘，馬上把電話掛斷，我始終不知道這通電話是誰打來的。

不可以想當然

我也接過剛出道記者，打電話邀我上電視節目或接受專訪，當他（她）們發現性別不對時，會傳來一串驚呼聲，我習慣反應：「你以為黃肇珩是男的對不對？」接著我反過來訪問他（她），緩和飛越空間的不安。當過老師，又教採訪寫作課程，我不忘「機會教學」：專訪前，應做好準備工作，最起碼要清楚被訪問者的背景資料。這些「電話學生」，後來都叫我「黃老師」。

大學院校新聞或大眾傳播系科的學生，都有報刊實習課程，有一位很熱心的老師，親自打電話，推介一名學生來《中華日報》採訪，我欣然接受。當我伸出手歡迎這位年輕人時，她呆住了，驚愕地看著我：「我以為社長是男的。」我告訴她：這是很正常的推理，但是，做為一個記者，是不可以「想當然」，因為許多事情是有例外的。

老同學的幽默

記者也會被人冒名頂替，冒我名頂替的，卻是男性。

我的好朋友王家誠，趙雲夫婦，是國立台師範大學校友，家誠是藝術家，趙雲是文學家，我們新聞組的學妹。

有一天，家誠來信，很生動描述一位「中央通訊社記者黃肇珩」，到台南師範專科學校採訪音樂演奏會的新聞：「在這平靜的地方，記者請還請不到呢，現在惠然來訪，所以帶來不少興奮的氣息。他向校長自我介紹，校長把他介紹給教官，教官把他介紹給音

樂老師，細長、白瘦、衣冠楚楚、氣度不凡，他說，他是師大教育系畢業的，說來也是同學。音樂老師再把他介紹給我，因此，我一度握過他那具有文化氣氛的白手……」

家誠很戲劇性追蹤這位黃肇珩記者，發現他可能是台南一家信用合作社副經理的兒子，據說，做過晚報記者，後因精神出了問題被辭退，但他始終幻想是個記者。「妳看，我這『00 七』當得怎麼樣，中央社要不要聘我做特派員？而且妳也可以知道妳的名氣何等之大了……」

我回信謝謝家誠，我說，不是名氣大，是名字誤導了他。

恢復女兒身再判無罪

報社發行人，是法定代理人。擔任報社發行人，都有挨過告的經驗。

《中華日報》有南，北兩社，台北是總社，台南是分社叫南社，除了副刊和社論和總社統一發稿外，一般新聞相互支援，各版獨立作業，分別印刷，發行。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期間，南社報導余家倒債案再掀高潮，並刊登余家貸款資料，指享有特權貸款行為。立委候選人余陳月瑛認為這項報導違反選罷法，向高雄地方法院提起自訴。我是《中華日報》發行人兼總社長，就自然成為指控的對象。

這個案子，全權由南社處理，我只知道結果：「沒事」。也就忘了。

最近整理資料，發現中央社老同事朱欽寧寄給我一張《聯合報》七十三年（一九八四）三月三十一日剪報，在第七版（雲嘉南綜合版）左上角六批闌欄四行標題：「黃肇珩女士挨告 被推事誤為男性，二審替她恢復女兒身，撤銷原判決再判無罪」。新聞導言：「《中華日報》社發行人兼總社長黃肇珩女士，高雄地方法院推事卻把她誤為男士，台南高分院審理余陳月瑛上訴黃肇珩違反選罷法案時，發現此一錯誤，認為茲事體大，因此，原審雖將黃肇珩判決無罪，但台南高分院仍將原判決撤銷，為黃肇珩恢復女兒身後，再作無罪之判決。」

這又是我的名字惹的禍，勞動法院做了兩次判決，「黃肇珩」三個大字上了標題，好耀眼，可惜不算是什麼光彩事。

名字，自我的象徵

我深深了解，名字只是一種符號，對於寫錯或男女不分，卻不會在意，也不去更正；有些錯得有趣，還去研究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錯誤。但是，對於總統府，外交部出錯，覺得不可思議，因為這些機構，通常處理「禮賓」事務，都非常嚴謹、周延。

我從擔任中央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就參加總統府每月一次的國父紀念月會，那是列席，是在場唯一記者，任務是採訪新聞，事實上是在「看」過程，「拿」演講稿，算是「採」而談不上「訪」。連續十多年，總統府送來的列席證，頭銜、姓名，完全正確。監察委員六年，是出席人員，有一次我發現出席證上的

名字「珩」變成「衍」，考慮了很久，最後決定主動告訴他們，我向會場接待人員提了一下，他立刻向我道歉，事實上，他不是承辦人，但他的反應和表現留給我很深的印象。

記憶中，外交部最少有兩次以上，誤認我是男士，邀我攜「夫人」參加雙十國慶酒會或宴會。第一次，我很生氣，認為外交部不應該發生這種錯失，附了一張很客氣的便條，把請柬退了回去，沒有回應。第二次，我已不生氣，但很難過。有一天遇到在外交部貴為司長的朋友，向他提起這件事，他很驚訝，說要查一查原因，結果，一樣沒有下文。

我想：如果這種錯誤，發生在駐華使節，外賓，或國會議員身上，結果又將如何？！

儘管，我的名字難唸、難寫，也難記。但是，我還是很喜歡「黃肇珩」，至少，在電話簿上還沒有出現第二個「黃肇珩」。



輯四

我們

○我的寶寶

似乎，天下的媽媽們都有一股傻氣和一份稚氣，她們都認為自己的孩子聰明、漂亮、乖巧…。話題一轉上「我的寶寶」，媽媽的臉上就牽上了笑容，就拋開了謙虛，就情不自禁地滔滔不絕……。

我有兩個寶寶，兩個使我忘憂、教我打起精神的寶寶；兩個加我的心憂和令我精疲力竭的孩子。

七歲的男孩和四歲的女娃，在興趣、性格、模樣兒上，就開始有了那麼大的距離。他們都太小，不懂得容忍，不懂得謙虛，也還沒有體會到兄妹親情的可貴。哥哥總喜歡逗得妹妹哇哇叫、淚水汪汪的，妹妹又往往膩得她的哥哥急跳腳。我常說我兒子是慢性子的人，他說，有時候他也很性急，那是當他妹妹搶他心愛東西的時候。他說他真想揍她，手剛舉起來，就想起爸爸媽媽的話：好孩子不打人，哥哥不打妹妹。我聽了感動得眼眶裡熱淚直打轉，孩子就是這麼天真可愛，媽媽總是好衝動。

說真的，他們兩個不知道什麼叫挨揍。我們從不打他們，做錯了事，打破了東西，或是兩人爭吵，我們都是拉著他們的手問，然後告訴他們什麼地方不對了。哥哥比較內向，但是個性很倔強，如果不是他的錯，他會堅持不說：「對不起」，也不大聲辯護，有時悶得你急死人。妹妹外向，開朗、好強，那一張小嘴絕不吃虧。

才滿三歲，她已經會用一大堆「可是」、「已經」……等一大串連詞副詞，而且用得非常恰當，她接受媽媽的任何「裁決」，乖乖地向人道歉、拉手，一轉身什麼都忘了。哥哥說她是個傻丫頭，傻得好可愛，傻得你不得去親她。

他們有一滿「小屋」玩具（四疊大的小房，堆著玩具，我們叫它「小屋」），和一大架子的娃娃書。他們的爸爸最捨得買玩具，媽媽只曉得找書。加上三個光棍的叔叔和舅舅，東一輛腳踏車，西一部小汽車，還有無所不依他兩兄妹的奶奶，這對寶寶有福了！

每晚，我們這對記者爸爸媽媽歸心似箭，而且要挖空心思帶回去一兩件「東西」。摩托車剛停下，屋子裡就出來：「爸——媽——」拉著又長又尖的歡呼聲，兒子是靜心小學二年級的學生了，送來的第一句話不再是：「有什麼好東西？」——而是：「我的功課做完了。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妹妹接了哥哥的棒：「有什麼好東西？」

我們實在不忍心看他們期盼了一天的「好東西」落空，每晚，總得意思意思。電動玩具，已不引起他們的興趣，小孩子總是喜歡自己動手，教他坐著看車子跑、青蛙跳，真是膩味。帶本書回去麻煩可不小，必須派「專人」讀。奶奶曾經擔任好幾年「讀書人」，一讀、再讀、三讀，書讀破了，奶奶讀暈了，孩子也聽得會背了。現在，哥哥不需要人家讀了，還可以權充「老師」，講給妹妹聽。

我們家的人，都有一個怪習慣：上廁所、一定要帶些書報；睡覺前，必須靠雜誌書籍催眠。於是，兩個孩子也染上這個怪習，從

他們能自己坐上小便盆，我就會很無意地遞給他們一本娃娃書，為了哄他們睡覺，我們經常是「討價還價」該讀完幾本小人書。假日，如果我想安靜做點事，最好的辦法是抱給他們一大堆書，或是給媽媽蓋間房屋。夏天，在洗澡盆裡放滿水，擺上小船、小人，一玩一個多鐘頭，又學游泳，又避暑，還洗了一個冷水澡，一舉數得。

我的兩個孩子，都是牛奶餵大的，他們沒有患過腸胃病。胖嘟嘟的，紅撲撲的。我們儘量依照醫院的規定，按時給他們作健康檢查，注射各種預防針。一發燒，趕快上醫院，孩子發燒是疾病的前奏。我相信，所有的媽媽都會同意我的這個想法：寧願給孩子吃好的、穿好的，只求孩子不生病，天下沒有比孩子生病更令媽媽憂心的了。我只要一聽到孩子生病，就嚇得像個孩子般老是淚汪汪地，什麼都做不下去，夜裡不敢睡覺，拿著溫度計，提著冰袋，等著熱度往下退。我想，世界上沒有比母親的愛更自然、更純真，可惜當我想把這份體會告訴我的母親時，她卻離我那麼遠，那麼遠！

我有兩個好寶寶——馬中駿和馬中珮，他們雖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在他們媽媽的心裡，他們是純真的、智慧的、健康的——健康的孩子不愛哭，健康的孩子不知愁，健康的孩子永遠是快樂的、活潑潑的。

（原載「今日遊樂」第四期）

1969.1.4

六十來坪園地、五分之二左右的平房，中駿的嬰年活動在此，不知憂慮，沒有重大的恐懼、壓抑，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樂、開暢的一段時光。

午睡時間，他躺在奶奶的身邊，靜靜聽奶奶唸「猛牛費地南」的故事，敘述一隻秉性平和的西班牙鬥牛。日日反覆，奶奶稍有錯漏他會提示，似乎他感染了費地南喜愛臥在櫟樹下冥思的瀟灑，剛巧他生肖屬牛。

父母因工作早出夜歸，午夜前後他已在客廳等盼，聽門開鎖聲，他蹦跳起來：「爸！媽！有沒有好東西？」那是他一天快樂的期待。

他童年玩伴，只有左鄰一位大他一歲的小姊姊，他曲意迎合爭取多陪他玩一會兒，卻在一次小姊姊弄詐套取他一輛心愛的小車，他哭了，感受到人與人間也有不可信賴的一面。媽媽哄他生個妹妹陪他玩。四年後，中珮出生，他反而成為妹妹最好的玩伴和小老師，似有長者的意識，處處禮讓妹妹，兄妹情深。

八月底出生的他，幼小入學，和同學幾個月的年齡差距，雖減緩他的領導力，但在學業上一直是敦品勵學的好學生。他是家裡、校內都不製造麻煩的好孩子，也頗有人緣。

就讀建中以後，一度他對讀書有了困惑。問爸爸：「讀書有甚麼用？」爸爸反問：「你覺得不讀書現在可以做甚麼？」他領會了，回歸讀書，考取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聯考壓力後的大一學生，大部分交織在郊遊和舞會中，中駿第一學期成績單出現紅字。有一天他向爸爸表示想當家教。爸爸問他：有了女朋友？零用錢不夠？你想每月賺多少錢？他回答了數字。爸爸約定：這筆錢我直接給你，不必家教，但是請你在未來的成績單上免除紅字。

中駿果然守約，二年級起一直領台大書卷獎，也以優異成績取得美國多所名校的博士全額獎學金，他選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大氣及海洋科學研究所直攻博士學位。畢業後，他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大氣科學研究中心、美國太空總署噴射推進實驗室（JPL）從事研究、教學工作，在美國全錄公司（Xerox Corporation）主持新的科技開拓計畫等挑戰性工作，也都很有成就，但是，最令他驕傲和快樂的是擔任南加州洛杉磯中文學校教務長，校長，那段時間，他和一群熱心、關心下一代中文教育的家長們，在人力、物力匱乏的環境中，默默奉獻，為傳承中華文化盡心盡力，義務付出，留給師生很深刻印象和懷念。

2004 年是中駿人生最大考驗的開始，他因視力模糊，就醫美國 UCLA 醫學中心，診斷為大腦中松果海綿狀血管瘤，經過三次手術，恢復良好，只留下複視後遺症。2011 年，腦部另一部位發現新腫瘤，第四次手術後，他墜入長期與病魔搏鬥，生死拔河的環境，受盡折磨，但是，他從不抱怨或發脾氣，他心之廣闊，似乎能容忍萬千的苦難。我們看了心碎！

後三年遍歷放射性、化學藥物、幹細胞移植等治療，留下後遺症。2014 年開始左手腳失控，視力衰退，過去記憶猶在，隨機記憶只能短暫留存。所幸他記憶主要隔存在 2014 年之前，前此所學、所歷、所交，都能記起。之後一切，斷斷續續，已沒有時距感。重覆的問句：我為甚麼在台灣？我是不是快不行了？快死了？腦腫瘤危機感，一直隱存在他心靈深處，我們面對這種狀況，既無奈又暗幸，若他記憶清楚，精神一定崩潰？

商得美國醫方同意，我們帶中駿回台灣觀察照顧，兼作復健醫療，實質生活中駿完全不能自理，白日由外勞及居家服務人員幫助，晚間和我們同房隔榻共度。他自覺不便、不安，時時向父母表述：我很不孝，你們養我、育我，還要辛苦照顧我。他滿懷愧疚與感恩，也時時透露對在美妻子和兒女的思念，他默默承受身心的煎熬。

離世前兩個月，最大病癥是偶爾吞嚥困難，又不能掌握進食節奏，一咳嗽，食物全噴出來，媽媽按照復健師指導步驟餵他，緩慢又費時，中駿有點不耐煩，看著他喜歡的菜餚，無法立即送進口裡，那種失落感，我們能體會，卻無能為力，只有不斷勸慰和鼓勵，彷彿呵護兒時的他。

醫生對吞嚥問題非常重視，經過掃描檢查，發現腦瘤復發，將壓到腦幹，只能以藥物控制，靜觀其變，怕引起肺炎，插了鼻胃管，喜歡美食的中駿，再也嚐不到食物的味道，他試著拔掉鼻胃管，想喝一口咖啡而不可得，我們看著心酸。

住進國泰醫院一個多月，只是消極性維生處理，規定住院時效已到，我們輾轉請託，獲得國泰醫院汐止分院護理之家床位，住進不到三天，於 2019 年 5 月 1 日下午 8 時 19 分在父母、妻子、親友不捨、自心不甘交加下，緩緩吐出最後一口氣，斷絕了 58 年的人間塵緣。

中駿的離去，是悲傷又是釋放。過去十五年來，我們的心隨著他的病情起起落落，無法平息，深怕隨時失去他。又很幸運，將近五年在台北和他日夜相處。

尤其是在最後階段，他早已中止工作，我們也退休多年，與社會已無實質的往還。大量親友的關懷、扶助、支持，自動湧來。使我們沐浴在真情溫暖熱潮中，沖淡了和中駿的離傷。

人生比諸宇宙，短暫得連白駒過隙都不及。對個人與親友間，卻有無限又不可計量的種種，留在相互的記憶中。至少曾經擁有過，是彼此最大又珍貴的機緣。

中駿，謝謝你留給我們 58 年的珍貴記憶，也謝謝你加給我們這麼多親友與同學熱情的溫暖。

爸爸 媽媽

卡老虎·史努比

缺文

缺文

輯五

家

我們相識七年才結婚，他等我唸了四年大學，和做了兩年記者。對婚姻，我的態度是嚴肅的；對婚禮，我的想法很浪漫。在這嚴肅與浪漫之間，交織呈現在我們每一張結婚照片中。

我們希望有一個莊嚴、不吵雜的婚禮。因此，找場所的時候，預擬了兩個條件：走進大門，只有我們一家婚禮，免得亂哄哄；禮堂要能鋪設長長紅毯，好讓新娘慢慢步過，接受親友的祝福和讚美。我們選擇了三軍軍官俱樂部，三十年前，這座位於延平南路的俱樂部，在臺北算是很有氣魄，婚禮以後開出來的賬單也很夠「水準」，親友們致送的禮金，幾乎無法支付當天的費用，尷尬極了。

通常結婚都要翻黃曆選吉日，我們的婚期完全在配合俱樂部的「檔期」，一改再改，根本沒有考慮是不是好日子。今天看來，我們是撞到了良辰吉日，不然那有這麼幸福、美滿的三十年婚姻！

我堅持結婚禮服雖然是租的，但是要全新的、要量身訂做，那些絲緞、白紗全要外國進口。新娘禮服租金八百元，小花童二百元，合計新台幣一千元。那時候，我的中央社記者月薪是一千二百元。

我們的結婚戒指，是一對十四開圓圈圈，那是珠寶店裡最便宜的，也是最平凡的。我認為，結婚戒指不在價值多少，而在它的永恆紀念。事實上，這個「結婚戒指哲學」是來自母親一句話的啟示：

當她為了支付父親的醫藥費和孩子們的學費，被迫變賣結婚鑽戒時那痛苦的掙扎，她說：「我寧願它是一個不值一文的銅環。」

我把一個「銅環」套在驥伸的左手無名指上，三十年了，他的手指長胖了，我們的「銅環」也取不下來了！

結婚之前，我沒有化過粧，惟一的化粧品，是一枝無色的「口紅」。

大家都說新娘一定要化粧，我跑去向王師母（王洪鈞老師的夫人）求救，她介紹了一位很有名氣的女士為我化粧。

對鏡子一看，我不認識自己。經過修飾的眉毛，被描得又黑、又細、又長，過分對稱與工整，顯得好呆板。黑黑的眼線、白白的蜜粉，加上腮紅、口紅，；也許，一下子臉上增添了太多色彩，壓得我難以承受，我好想哭。旁邊的人都說好看，都說新娘理應濃妝豔抹，還一再叮囑不可以亂擦。那時候，台北沒有專為新娘設計、化粧，甚至數次試粧的美容院，化粧的技術也不像現在這麼進步，個個新娘似乎都是這樣的「面目一新」。

驥伸由伴郎施克敏（我的同班同學，名記者）陪著來接我去拍結婚照，他們對我一看，滿臉驚訝。新郎衝口而出：「怎麼這麼難看？」三十年了，我沒有忘記這句話，他仍然無法接受我的濃粧。

我們在攝影師的指導下拍的結婚照，緊張、呆板又沒有笑容，我拒絕放大掛在牆上。中央通訊社攝影組同事在禮堂為我們拍的結婚照片，卻很生動。最珍貴的，是名攝影家鄧秀璧先生拍的彩色照片，在當時是罕見的。

三十年歲月，匆匆流過，今天重拾三十年前結婚照，彌足珍貴。

我看報，已成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家的餐桌一直是長方形的，就是方便一家人在早餐時看報。晨起後第一個一百分鐘，我大約翻閱十份以上報紙，分從兩個角度著眼：專業的、工作與生活層面的。

在十多份報紙中，我選出三、四份有代表性的報紙先看，報紙送到的先後也有關係，七點鐘以後送到的報紙，非必要，大都不會去看了。我的經驗：送達太晚或送得不正常的報紙，是會失去者的。

每份報紙，都從第一版看起，順序翻完，不跳過任何一版包括分類廣告版都至少要掃瞄一眼。順序翻閱，是因為要看的報紙太多，依序翻下去，避免亂了、漏了。看廣告和分類廣告，是在了解報紙的營運。

以專業角度閱讀報導和評論時，比較嚴格，總是滿意的較少，批評挑剔者較多。尤其我是採訪出身的，又教新聞採訪寫作，在這些方面，更難忍受不佳和不當的表現。有時看得發火，很想立刻打電話給報社或那位記者，幸而時間不對，從沒真正實行過。

看到有懷疑的，我會參閱其他報紙的報導。如果有參考或值得探討之處，隨時會摘記要點，或先用紅筆圈畫，有時索性立刻剪了下來。

坐在餐桌對座的外子，翻到開「天窗」那一版，會投給我會心的一笑。他是同行，看報也是必然的一課，我們經常在早餐時就報紙上的處理交換意見，討論、甚至辯論。

吾家有三多

我們家有三多：書多、玩具多、笑聲多。

我的婆婆常常抱怨，說她被書「坑」了四十年。

從她踏進馬家的大門，就為書所苦，嬌生慣養的獨生女，最討厭書，偏偏嫁的是最愛書的老師，他嗜書如命，他自己讀書，他迫他的新娘子讀書。過門三天，新娘子除了下廚房，也上書房，練字、苦讀。我的公公是黑龍江有名的才子，不僅書讀得好，還寫一手好字，他刻的印章，獨創一格。

買書，更是他的癖好，他抱回來的書，多是從舊書攤上掘寶出來的。他形容這些書是顆顆晶瑩的珍珠，但我婆婆說，那些書一點也不堂皇，更不美觀。它們是古樸的線裝書、善本書、字帖和印譜。經常，他把一口袋的薪水，換回來一批破爛書。當我的婆婆向他要買菜錢時，他的頭從書堆裡伸出來，又縮了回去；他在充滿的書頁中，咀嚼樂趣，她在書牆外徘徊苦思。

多少快樂的笑聲，從書房裡溢了出來；多少的夫妻勃谿，也縈繞在書叢中。

抗戰期間，這對夫妻離開老家東北，跑遍北平、青島、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廣州、香港而台灣，輾轉萬里路，什麼都掉了，除了人就剩下一箱箱心愛的書。

我的婆婆一談起這段逃難的苦日子，就有氣。她說：「我媽給我的嫁妝，全典當光了，就是他的書不能動，上飛機、下輪船，最重要的是他的書。」他用書擋住她的長長抱怨，她只好笑了。

有許多人喜歡買書，但不讀它，買回來了，往高雅的書架上一放，似乎也就了卻了心願；也有人買書，是在裝飾自己的知識淵博。我的公公，他買書，也讀書，他並不是為了要使心智得進步而讀書，他是為了享受而讀書；隨手拿過一本書，想讀時，便讀一下子，絲毫不含強迫的意味，或連帶著某種目的。

他最欣賞詩人黃山谷的話：「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根據林語堂博士對「面目可憎」這四個字詮釋，即並不是相貌的醜惡，而是意在培植面目的可愛，和語言的有味。因此，世上會有可憎的美面，也有可愛的醜面。黃山谷所謂的可愛的面目，不是由花粉胭脂裝成的面目；而是由思想力粧飾的面目。

帶著智慧，可愛的面目，我的公公留下相隨數十年的書走了。他的三個兒子，接過了他的書，也承襲了他的喜讀書和好讀書的習慣，再加上我這個愛文學、當記者的媳婦，這個家更熱鬧了。我的婆婆說，這叫作火上加油。除了書，我們家每天還有四份日晚報，每月十多種雜誌，這是我們互贈的生日禮物，多少年了，我們總是你為他訂一年這種雜誌，他給我訂一年那種雜誌。於是各種各類的書刊，終年在我們家裡的各個房間裡流傳著，連續不斷的共鳴笑聲，也由一個房間飄向另一個房間。

每逢生日，我最大的願盼，是馬家三兄弟為我搜尋來的好書，它們帶我步出日常繁瑣工作的圈禁，神遊在另一個世界中。面對一本好書，就像與一位智慧者促膝長談，由他引領著走進另外一個國界，另外一個時代；或傾吐自己胸中的不平，或討論一個從未知道的生活問題。如果看一本古書，往往我的心靈似乎與長眠已久的古人相對相通，於是，闔上書，想像這位古作家的形態，和推測他是怎樣的一種人，樂趣盎然。

有人說：讀書是文明生活中所共認的一種樂趣，極為無福享受這樂趣的人所羨慕。我們如果把一生愛讀書的人，和一生不知讀書的人比較，便能了解這一點。凡是沒有讀書癖好的人，就時間和空間而言，簡直是等於幽囚在周圍的環境裡。我從我的公公和我的父親的讀書癖中，體會到這一點，他們的物質生活並不富有，但是他們都是精神生活的富豪。

最近幾年，我們家增添了兩個小寶寶，他們也步爺爺和爸爸的後塵，嗜書如命，花花綠綠的娃娃書，一批批往家裡搬，奶奶一付的無可奈何，有時她為整理滿坑滿谷的書刊冒火了，於是她又抱怨：「我真受夠了！」她不得不承認這是命，年輕時，丈夫逼她讀書，現在都六十多歲了，孫子孫女又迫著她唸書，她老人家擔任了許多年「讀書人」，幾乎每本娃娃書，都經她一讀、再讀、三讀，書破了，奶奶讀暈了，孩子也聽得會琅琅上口了，奶奶摘下老花眼鏡，驚訝地、欣慰地對著愛孫哈哈大笑。我們的鄰居都羨慕她老人家，都說：二十年相鄰而居，馬家傳出來的都是快樂的笑聲。

除了書，我們家最多的是玩具。如果說，我們家可以開間玩具店，一點也不誇張。孩子們有時站在玩具店的櫥窗前，選不到一樣他們要的玩具，因為家裡都有了。我看到他們一臉的失望，決定不再給他們蒐羅玩具了。

這一代的父母，似乎都容易犯一個錯誤——為補償對子女的歉疚，造成的錯誤。

我們這一對記者夫婦都很忙，過的又是晨昏顛倒的生活，難得陪孩子玩上一天半天的。每晚，當我們帶著滿身的疲憊夜歸時，總要為孩子們期盼的「好東西」，傷透腦筋。摩托車剛煞住，屋裡就傳出：「爸——媽——」，拉得好長好乖的歡呼聲，接著是迫切的：「有什麼好東西？」就為滿足他們期待了一天的「好東西」，我們成了玩具店的巡探。我們曾自認聰明地，利用休假日，蒐購一批兒女的「好東西」——要富教育意義、要有啟發性、要不危險、要不打破窗戶、要美觀、要……。當然，還得不太貴。於是，我們像遊魂似的，從一個櫥窗飄向另一個攤位，然後抱著足夠換取七天驚訝和笑聲的玩意兒，藏在辦公廳裡，分批帶回去。

我們為了買辦些「好東西」，忙了四年，儘管吃了不少苦頭，但是我們心甘意願，我們都喜歡看到這對小兄妹見到「好東西」時，從心裡浮向紅撲撲小臉蛋的歡笑。於是，我們的歉疚消除了，一陣愉快的笑聲，從我們的臉上擠向心底。八隻大大小小的手，不停地動著，我們一起享受了「好東西」，帶給我們一家連串笑聲的「好東西」。

我常自嘲說我不發胖的原因，是由於有恆的運動——拾玩具。我婆婆終年跟在我們後面撿書刊；我呢，終日隨著孩子的腳跟收玩具。從大門口，到院子、草坪、客廳的地毯上，房間的角落裡，甚至浴室，到處都是他們佈置的城堡、車站、山巔、庭院、戰場和太空世界…經常，浴缸裡沈浮著金髮女郎和殘兵敗卒。

我沈迷在孩子的笑聲中，沒有一絲絲的抱怨，我為他們買玩具，我替他們收玩具。直到有一天，我在玩具世界的窗櫺前，見到了那一對失望的、喚不起新奇和感奮的小臉，我覺悟了：得了太容易，和得了過多，對孩子們是一種損失，一種感受不到珍貴和自我表現的損失。我也發現小孩子的好奇心，是循環性的，我悄悄地藏起來一部份已被他們「遺棄」的「好東西」，過了一些時間，再搬出來，獲得他們更多更深的驚奇和痛愛。

「好東西」的歡呼聲，已由吾家深夜的門扉裡，流向擁擠玩具的市場，這些純真的歡呼一樣是發自孩子心靈的深處，但在期盼之外，有了新鮮、感奮和小小自我的驕傲。今天，圍著他們四周的「好東西」，都象徵著他們一次的好行為、好成績、或一週好寶寶的榮譽。他們珍惜它，因為它們是他們心目中的「好東西」，賦予意義的「好東西」。

我們家的笑聲，是成串的，我們家用書用玩具穿起串串快樂的笑聲。

提著吾家的三多：書多、玩具多、笑聲多，步過十年開滿花朵的婚姻生活。我說：「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原文刊於 today magazine 1970

馬家簡史

寫給我摯愛的小孫 翊友

Dear Emil：

三百多年前，我們馬家的祖先，從中國南方的湖南，經過河南、山西、內蒙古、熱河，到達當時由滿族人占據的東北定居，住在今日的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齊齊哈爾是滿洲話「綠色草原」。

從爺爺算起的七世祖，因有戰功，受封一品將軍，賜給城外很大一片荒地，馬家用來放牧很多駿馬。

1933年，爺爺兩歲的時候，因為中日戰爭，就隨父母，離開我們的老家齊齊哈爾，到了北京，1934年來到青島。

1937年七七抗戰開始，我們為了逃避戰火，輾轉流動遷移，在上海遇到第一次的日本轟炸，戰爭中著名的南京大屠殺前一星期，我們很幸運逃離南京的時候，是搭乘小舢板，駛向停在長江江心的「大江輪」，攀著繩梯爬上甲板，到達武漢時，又碰上日本大轟炸，警報一響，就匆忙鑽進防空洞，常常聽到日本飛機丟下來的炸彈，在附近的爆炸聲，感受到天搖地撼的大振動，驚心動魄！

我們繼續流轉，到過長沙、廣州，一路上我們坐的火車，都擠滿逃難的人，大家先把小孩子從窗口推進車廂佔座位，有些擠不進車廂的人，爬上車頂擁坐，沿路常因日本飛機經過，火車暫停，幸好我們沒有遇上日本飛機的掃射。

1939 年我們經香港，回到上海租界。

1941 珍珠港事變，上海租界也被日本接收，我們又開始躲美國飛機的轟炸，爺爺還撿到一顆美國飛機機關槍的子彈。

一九四六年，爺爺隨父母和弟弟四個人，到了台灣，才開始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安定生活。

奶奶的故事，等她自己說吧！

爺爺 驥伸

Grand Pa Hoyt 2015.6.12 台北



輯六

祝福
·
共勉

母親節

浪子回頭時，
誰是第一個高興的人？
學業退步時，
誰是最憂慮的人？
身體生病時，
誰是最焦急的人？
失去朋友時，
誰是給予最多安慰的人？

只有您——母親！

願這一張小小的卡片，
能表達我的感激之萬一！

祝

母親節快樂

兒

中駿上

1977

這張卡片是中駿自己裁紙摺疊的：簡單的白色卡紙，用彩色鉛筆，淡鉤出一幅素描：座落在一隻巨大康乃馨上的小屋，屋頂煙囪飄升炊煙，小屋右側一棵裸枝高樹。

全景背襯的是巨大的心形線影，全圖只四種淡色、幾十筆線條，要非常仔細才能分辨出是名家畫作的印製品。

祝媽媽：

母親節快樂！

我只想在妳臉龐上找到一束康乃馨的微笑

兒

中駿敬上

1978 年母親節

（以下是同卡左頁 中駿自題賀詞）

母親的偉大，豈是這一小張卡片所能言盡的；

母親的辛勞，又豈是這短短的一日所能補償的？



兩張賀卡

雖然我們一家人都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感，
但我們彼此的情感絕不比任何人少。

中 駿

媽咪：

您對我們的關愛，是無論我們做多少頓豐盛的晚飯，
撒多少瓶鹽、醬油和味素，也報答不盡的。

中 珮 敬上 1981.5

（原卡封面文：「媽媽，今天是母親節！我們想替您作頓特別豐盛的晚餐 但是呀
…」下面原圖是廚房料理台前，戴著主廚高帽的胖娃娃踩在矮凳上攪拌鍋裡的待
烹食物，臉現無可奈何地笑容。）

（原卡內頁文：「…請問，鹽擺在哪裡？醬油呢？對了，是不是麻煩您也把味素
拿給我一下？」happy mother's day ！）

媽咪：

想來想去，畫裡這種混亂的局面，實在只有我才攪得出
來，所以就讓我單獨地在此獻上我對您的敬愛。

感謝您每天「跟在我屁股後頭撿東西」，使得我的房間像
圖片上這種「壯觀」景象的機會都化成了短暫的一剎那。

Happy mother's day

中 珮 敬上 1981.5

（原卡內頁畫面是：凌亂至極的娃娃臥室，床上 櫃面 椅座 櫥架 地板……大大、
小小、方方、圓圓、歪歪、倒倒、橫橫、豎豎……奇形怪狀，亂七八糟……）



父親節

爸：

若是真的有「most valuable person」這個獎，
你應該是第一個得獎的人。

中 駿 72 年父親節

（原卡是一張約 A4 大的小熊雕形，手舉獎杯，身著運動背心，胸前大字「most valuable person」。內頁大字「you're number one with me ！」）

For my husband happy birthday

在你半個世紀的人生中，
我佔有了將近三十年！
在你再一個（半）世紀中，
我要全部擁有！
讓我們——仲與珩
共享更美好的人生！

珩 1981.4.20

（原卡圖示是一隻卡通犬，頭上一頂奧地利式「綠」草帽）…… to my favorite roommate ！）



嗨！小河馬！

記得我們共同擁有的那一副大小河馬踏步圖嗎？

如今，小河馬的確健步飛躍，不但並駕齊驅，實際上，很多地方已超越大河馬了。

大河馬留下眼淚，不是嫉妒的，是從心裡湧溢出的快樂無匹、祝福無限的喜悅之淚。——其實，一滴眼淚也沒流，那是存在於感性的象徵之境的。

To homa junior

Grand homa

1987.3.17

我把人生分成生存（必要的感官和機能層面的供應與獲得）、生活（提升生存所需層次到有些氣氛情趣，再揉入一些有意致甚至意境的況味）、生命（達致精神、理念、思想三種層面的價值與意義，超乎個人以上的價值認知…）三種層次。

研究生命環境，是人生的又一種階段，除了專門研究（高能物理）和專門興趣（音樂）——這些使你超躍入體驗生命的人生層次——之外，也把捉一些生活層面的情味吧！

給

中 珮

1987.1

面對這空白的內頁，久久下不了筆，似乎要說的話，你都知道，你都明白。二十三年的交流，屬於我們雙向的部分，已達到無須開口的境地。

日本之行，又增添了愉快的片羽記憶，今後儘可能多找點機會，大家相聚，享受那本然的默契之樂。

寫 給

中 珮 祝生日快樂

爸 媽 1988

with love to my husband
Happy Birthday

For my
wonderfull
wife

一段故事：

今年新年，馬爸爸、馬媽媽、舅舅和珮珮一起逛台北百貨公司，我們懷著「矛盾」，尋找第三個「河馬男」或是第一個「河馬女」。很意外在 sogo 的一個玻璃櫥裡發現了一個小小的水晶玻璃的「河馬」，沒有標籤，我們無法辨認「性別」。馬媽媽和女兒，在馬爸爸逛別個區域時悄悄買下這個「小河馬」，藏了起來。母女相約，在老爸生日時獻上我們的所愛和老爸的所愛！

珩 1990

（水晶「小河馬」與此卡同時收到——老爹）

愛是一切，
是一切中的一切，
是一切之上的一切。

珩生日 伸作 1991

To dear 伸

愛與被愛，都是非常快樂的。
我們這一座家，就是在愛與被愛的互動中建立、繁衍。
你，付出的愛最深，被愛的也最濃。
我們都愛你，並為你的
六十歲生日祝福！

珩 1991.3.15（農曆）



二八
佳人

像是宇宙創始那個 big bag 所掀起的渦雲（假設有此渦雲），也像是象徵萬物源起的那個太極；big bag 擁有雷霆萬鈞的原創力，太極有生生不息的永恆開展契機。

祝你的一切順利成功，有如此一宣玄妙的祥符。

祝
二八佳人 中珮
生日快樂

爸 媽 1993



從互不相知，到無不相知，而永結同心；是婚姻的形成。
相敬，相諒，關懷對方勝於自己，榮辱、利害、甘苦同嘗，
是真實的愛。

經歷十年時光，婚姻與愛，已有充分的考驗。

以我們的經驗為你們提示，以我們的經歷作你們的例證，
以我們的愛向你們祝福。

給
中駿 芬芬

爸 媽
1996.6.6 於中駿芬芬結婚十周年吉日

This is huge Happy birthday

七夕，許下一個承諾，
在明年此夕之前，完成「新聞、採訪、我（黃肇珩）」的
助理編寫工作。

給 我的 同在鵲橋一邊的「智女」

馬 郎

民國八十六年、丁丑
（似乎不適合用西元）

瞧！今年河馬（原誤寫海馬再以紅筆在海上加一河字）
既「神」又「酷」又「帥」
一付「傲」然自得！
恭喜！今年豐收：兩本著作出版加上一個小孫兒降臨！
讓我永遠分享你的甜美耕耘喜悅！
讓我們永遠、永遠攜手共創更廣闊的愛的「世界」！
別忘了「飄雪五十年」！

伸

珩 1997.4

（原卡封面，是如同肇珩題字形容那般神態的河馬，頭上戴著一頂花彩小喇叭帽，腮下一大朵五彩花簇。）

稍遲，不算爽約。「記者 黃肇珩：記者生涯與真實人生」一書
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出版。我們特別裝幀了兩冊精裝本，封面
湯燙金字寫著：

這本書

留下我們牽手走過的 40 年印跡

獻給 伸

珩 2000 我們的日子

肇珩自存那一精裝本內扉頁，題文：

如同表紀我們婚姻的證書一般，雖然各擁一冊，永遠合聚，共
享果實。

伸 2000 我們的日子——攜手迎向 21 世紀

Happy Birthday

我們喜歡音樂，因而充實了我們的人生；我們熱愛人生，也共同譜出了我們生活的旋律。我們合力協奏的生之奏鳴，是我們最大的成就，也是我們最大的享受，是我們所擁有的最精純、最光耀的一顆同心鑽。

祝

珩 永遠年輕 永遠健康 永遠快樂

伸 1998 珩的日子

咖啡涵集了甘、苦、酸、芳、澀、爽多種對應相生的美味，醺迷又醒神、振奮又鬆弛、鼓舞又安撫；真正掌握導引的，是品賞者的意志與心向。控馭咖啡，不役於它。

超過四十年在咖啡壺杯之間的浸泳，所思所感，與段數已漸超越老爹的愛女中珮分享。

祝

生日快樂

我們隔空與你共浮（咖啡）一大白

爸 媽

2005.10.14

輯七

感恩

若知人超過知己，非人也！

偶得



我思故我在，

無我何來思？

須彌納芥子，我是芥子；

無我，須彌何有於我？

【無字·篇】

生 死

= 等生死)

未 來

? 不可知)

戰 爭

。 可止矣)

【三言兩語 · 篇】



這樣最好 ·
多了就俗了、漏了、破綻了…
自己也覺無聊了。

2020.9.13



知己，八成至己矣。
知人——特定的，五成已了不起。
知較多的人，三成已不易。
知人超過知己，非人也。

2020.9.11



七十而能從心所欲，是律己。
過了九十，只要無大礙，
任他逍遙些（限於不涉他人），是由己。

2020.9.11



非真傻的半傻，是自然地超脫。
難得糊塗，是太過精心的體悟，
尚未足夠超脫

2020.9.13



無聊 —— 煩惱又不煩惱。
有聊 —— 不煩惱又煩惱。
人生若一直無聊，似乎是白過了。

2020.9.13

【偶得 · 篇】



取之即得，求而可得，致力獲得，失而復得。
對當事人，前二者的欣奮，
遜於後二者。而後二得，孰更可貴？
則視事象本身及個人生活觀各有不同。

2020.6

到了

看到、聽到，想到…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到不等於到了，
多這一個「了」不是文法、修辭的「了」。
多想一想，才能想到了。

2020.9.16

大志

少年無知，什麼是大志？
青年無力，生計第一，那能顧到大志。
壯年無緣，攀不上赴大志之路。
中年無望，大志去矣。
老年無念，人生何須大志。

2020.9.16

過

過錯之「過」？錯過之「過」？
二者是生活中常會出現的。
錯過了，最好別想，更別悔。
只要記住「來者猶可追」。
有了過錯，能改，已是大善。
能不二過，那可媲美偉人了。

2020.9.16

計

哪個計？
三十六計，何止！
謀，何必，何苦。
畫，機率不遇，未必得成。
算，很多試算不到的。

得味

精心烹調，細嚼慢嚥，
未必得到最高境界的「味」。
不太經心，也略經心；
粗略下口，忽然得味。那可能是上乘之「味」。
人生萬般，同理也。

統計

可怕。
只要比例小，都不足道哉。
個人何在？少數人何在？

童心

無童年，當無童心。

老年返璞，那童心不是童之童心，是老之童心。
連帶有時老發童勁，卻有勁而無童力。

2020.9.13

名言

有時簡短到似乎：沒頭沒腦，
讓人一時茫住，反應不過來；
而又會讓人聽後——甚至久久，回味越來越多…
那豈不是上上的「偈」之類的名言。

2020.9.10

矛盾

沒有大霹靂的矛盾一舉，何來宇宙？
人既有生，何以必有死
一個趣對，
下聯是：老師吃得好大餅，吃到肚裡變成屎，
吃餅變屎費功夫，不如當初就吃屎。
（贅言：我曾當老師逾半世紀。）
無矛何來盾？無盾何來矛？

有筆

你！
我。
他？她？牠？它？
可無限引申…

稿

固定專欄：
作者一有壓迫感，煩，苦。
作品一品質常降。
偶得隨興：ㄉ一ㄣ
作者一意在筆先，較多佳構。
讀者一多新鮮感。

哭

不只是傷感、悲悽…
也是自然地放鬆。
對身心並非只付出，也是進補或收益。



輯十

憶 · 溯

一九四六的台北

和宇宙對比，
人，
幾乎是無法稱量的微粒。
宇宙與人類浩瀚的記述，
却是由無數微粒累積集結出的。
個人片斷、點滴的見聞、感思，
是集結的基本粒子。
且把鏡頭的時空，
朝向
一九四六—台北一隅。

街上常只見行人，時時或或，單多雙少，三五成群的很稀有。最初幾個月，沒見過整隊的軍人或學生和群眾。清晨揹書包上學的學生，稀稀落落。當時台北市人口約只二十七萬餘人，比今日的大安區還少很多。

公車大約一小時一班，沒幾條路線。人力車出現的頻率，比公車多不了幾倍。腳踏車較常見，有些順帶載貨，載客三輪車尚未在台灣出現。小汽車是引人注目的罕物，這一年我在台灣從沒有機會坐過。需要時得叫出租包車，大概沒有幾家也沒有幾部，事實上也沒多少人租得起。計程車是十多年以後的事。

晴空下，抬頭環顧，越過屋脊，大致可以掃遍台北四周盆緣山脈。遮住天際線的，只有那一座象徵政治和市區位置雙重地標意味的總督府，台灣光復已過半年，大家私下還如此稱它。不過，也只有它那突出的小小尖頂，還可看看，主體建築已是轟炸後的斷樓殘垣。

曾和一位本地少年朋友，遊逛到衡陽路博愛路交叉口，他指著那高居台北民間建築第一、號稱七層樓房「中華國貨公司」--日治時是菊元百貨公司，問我：「你們上海有這麼高的樓嗎？」我回答他：「上海最高大樓，有二十四層。」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即將邁入十五歲的我，和家人從上海搭乘海宙輪在基隆登岸，隨即和同船來台灣應聘的教師和眷屬一、兩百人，在台灣大學法學部禮堂擠了幾天地舖。

頭兩三個月，暫住徐州街臺大法學部操場對面的小小日式住宅，同院分住的還有李季先生和妻女，李先生後來分發到成功中學擔任訓導主任。最近經過那裡，夾在高樓之間還有兩所破蔽的日式老屋，其中之一，應是我曾住過的。

等父親工作派定了，我家遷到新生南路龍安小學對面巷內一棟佔地六十坪左右日式院宅。當時的門牌號碼是昭和町，不記得是幾丁目幾番地（後改新生南路三段十巷）。

平房、前面一列矮牆不設院門，後院草地。住屋前後紙門隔間，外邊另有木板拉門，備颱風時用。光線、空氣貫通，夏天暑熱時也不需用電扇，當時也極少人家有電扇。除了七、八坪一間地板客廳，其他各房都鋪榻榻米。廚房爐台是半灶式，燃料用多孔圓柱形

煤球。鋁製鍋壺，很少人家有冰箱—當時的冰箱是指用人造冰塊冷藏的冰箱。浴室較榻榻米矮下幾尺，放著一個木製大浴桶。廁所用蹲式便坑，一兩周有水肥車來清除一次。比起上海弄堂住家的木造馬桶，每天要來傾倒清洗，省事多了。

台北師範提供這一區七、八所日籍教職員留下的空屋，有些佔地超過百坪。當時選屋標準，是看燈頭、水龍頭、玻璃、榻榻米是否完整。事實上，日籍原住戶遷離時保持完整，空屋期間被不速客挖走或損毀。坪數大的，還嫌打掃費時費力。對我們這來自上海住慣狹窄空間的四口之家，三十多坪的住房，相當滿意了。

四周空宅甚多，我們住巷西側隔溫州街過去，更多台大日籍人員留空的宿舍，院坪更大。稍南沿新生南路的巷內也有幾戶大院，和我們同船來台的一位李姓商人就佔住其中一所，印象中就是現在的紫藤廬。他的女兒準備插班高二，託父親代邀一位數理教師補習，我要考大學也併隨旁聽，去過他家多次。房間多而整齊，庭院寬大，遍植花木，我們上課就在臨前院的客廳。最近再去看一趟，雖然已改建樓房，一樓原屋依稀有些當年景象。這所住宅也是官方宿舍，李先生想必疏通有路竟能暫時佔居。

外出大都步行，我們活動範圍一般約在今日羅斯福路、基隆路、復興南路、中正東路、中山南路之間。穿過新公園經衡陽路到西門町，已算遠程；萬華、圓山，感覺上視為郊區，連台北火車站都很少到過。

這一活動區內，沒有菜市場。我們家附近兩家雜貨店，出售柴米油鹽和不多種類蔬菜，買魚肉最近店攤，在南昌街寧波西街口。

我們家在七七事變不久從青島開始逃難以後，少有天天吃到魚肉的日子，到台灣後也習慣了。

許久才到西門町看一場電影，大家都走路；一小時一班公車，又不太定時，往往等車時間走路也到了。那段距離似覺比現在近些，是多了建築物阻擋，還是坐慣汽車後對路程的度量感改變了？光復時臺北接收市內公車五十六輛，大都破舊，只有四輛勉強行駛。民國三十五年底才擴增到二十八輛，分駛八條路線。那時去坐公車的人也少，這一年台北市公車乘客平均每天七千五百餘人，每條路線平均不到一千人。

平常在街上也很少看到有人乘坐人力車，遇有特殊需要，例如搬家，才雇用人力車。九月我入學師範學院（台灣師範大學前身），看到院長李季谷上下班或公出，也只是一輛專用的人力車。

整條和平東路直到六張犁，越向東，房屋越少，零星散現些兩層樓的店面。師範學院對面和師大路東側，都是一大片水田。晚上蛙鳴此起彼落，宛若置身鄉間。

信義路和中正東路間，原是日籍公務員宿舍區，院宅較密集寬大整齊，不過只在一段。過新生南路，房屋稀落，和平中學（後改師大附中）以東，多是水田。再向東去，還有包圍在田中的三合院。新生南路還是被瑠公圳渠道從中分隔的兩條側道土石路面，仁愛路一段兩旁大王椰雄峙，是臺北最開闊美麗的大道。

我們這樣來台就業的家庭，多沒有親戚，新交的朋友往來不密切。鄰近店家，由於語言隔閡，談不上幾句話，從父親一些內地來台灣同事得來的反應，大家似都同樣情況。平日偶爾閒聊，觸不到

時局，更不涉政治。像我即將要上大學的人，來台快到半年，知道行政長官叫陳儀，直到九月底入學師院後，才在學校圖書館的報紙上看到他的照片。台北市長是誰沒甚麼人談到，市政府在那裡？我們新到的這群，多半不知道。

一般家庭鮮少書報，我們家的書是上海帶來的。書店少，新書少，也沒甚麼可買的，書價又貴。新公園西口衡陽路的東方出版社，是日治時代新高堂書店改名，只有日治時代留下的日文存書和四書、詩經、戰國策、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漢文老書。一些賣日僑舊貨的夾雜不少日文舊書，頗有佳品，價極低廉。

我在台北第一次看到的報紙是新生報，一大張，其中還有一版用日文，五月起增加半張，日文版到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週年才取消。報費每月從三月的十七元（光復之日創刊時是五元），漲到年底的一百元。在台北發行的還有人民導報、和平日報等七八種，很少看到。

鄰居一位父親同事毛守豐先生，公餘代理轉訂京滬報紙雜誌，後來知道他和新聞界長者楊乃藩先生是上海大夏大學同學，楊先生當時在台糖公司任高職，邀他為台糖全省大小單位代訂大陸報刊。經常家裡一堆堆空、海運到的報紙雜誌，我有時臨時幫工，順帶翻閱。在台灣發行的雜誌能看到的不多，有些還是中日文並用。我自己按期買過日月譚月刊，投過幾篇短稿寫些與台灣有關的歷史掌故。倒是在毛先生家裡，順便讀到大陸空運來的雜誌，諸如觀察、紐司。電視尚未問世，收音機還不普遍。訂閱報紙的人家不多，一般民眾不太看報，似乎也沒甚麼急切要去關懷的消息。抗戰勝利沒

幾個月，國民政府尚未還都，各地接收復員大致都是那一套，誰去理會。國共戰爭遠在東北陝北，我這出生東北的人，都漠不關心。

說實在，我常接近的人，大都是和父親差不多出生在中華民國成立前後。他們所經歷的前十多年，南北政府混淆，到底誰真正能代表民國，很難分明。各地多是軍閥割據，自成一霸，一般民眾只求少戰亂、能溫飽，無所謂傾向那一方。民國十七年雖稱全國統一，但零星戰亂仍多。民國二十年日本佔領東北，不久正式對日宣戰，全國民眾因同仇敵愾才有了國家政權集中的意識。但是日本割裂了在中國大陸佔領地區，分成滿洲國、南京國民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蒙疆自治政府，散在這些地區的人又迷亂了。抗戰勝利不久，這一些原留淪陷區的人，被以異樣眼光看待，投閒置散，他們在有限可發展的空間選擇了台灣，對大陸的一切他們也沒有多大關懷的熱衷，國共內戰似乎和台灣隔著海洋，相去尚遠。這些人只求獲得幾年安定，舒緩一下多年來的顛沛流離，除了物價（從光復到民國三十五年底，十多個月，台灣物價上漲約近一百倍）、加薪，其他國事不想去傷腦筋。

在師院我主修歷史地理，閱報是必需的，也養成看報的習慣。我曾留意到圖書館所訂購報份並不多，我卻時常立即取得當天報紙，顯然當時師院學生不常接近報紙。

很少聽人談到消閒娛樂，更別說旅遊。父親交往的外省朋友，來台北七、八個月，除了從基隆登岸，似乎最遠只有人到過碧潭或仙公廟。出國，是大家沾不上邊的詞彙。電影都是中美老片，半個多月換片一次，我們在上海大都看過。

進師院後接觸了古典音樂，找唱機不易，唱片也極缺乏。少數富裕同學，有的也只是日僑留下來的舊機和不多幾張舊唱片。中山堂旁側的朝風咖啡店，是兩年多後才有。我和幾位古典音樂同好為聽音樂常去，也只是幾十張老唱片反覆輪放。

我們住的這一帶沒甚麼正式飯館，聽說過有所謂酒家，但不在我們這一區內。我家人和交往的朋友，很少有上飯館機會，酒家更不必說。有些小冰果店，頗有名氣的小美冰果店剛開業不久，以紅豆刨冰號召。孩子們常享有的是森永牛奶糖、手製冰淇淋、滾珠瓶口汽水和蜜柑。香蕉價廉到處有賣，內地來的孩子初來嘗新，兩三個月後，我就對它失去熱衷。

附近有郵局，我們家少有信件往來，不常去郵局，也不常見郵差到家。私家電話可能極少，公共電話不會用過，所以也不確知裝設在那些地方，平時上街，沒注意到何處有公共電話。銀行，對當時的公教人員和一般平民說，很少有機會接觸，他們大多寅吃卯糧那還有餘款儲存，想向銀行借貸，那有資格。日常收支，都是現金，頗有些人，從來沒見過支票。我十三歲那年曾因家境實在困窘，停學到父親的朋友一位日籍台灣人的貿易公司當練習生，常跑上海的銀行，到台北後偶爾習慣性地注意一下，我們這一帶街頭很少看到銀行。

我記憶中十五歲的生活圈，物資相當缺乏。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水電尚可，卻都不見得充裕。母親就有一次發現幫傭的「下女」從我家偷帶出去的東西裡，還有小小一瓶食油，其他用品連市場也供應無多。

說到家裡僱請女傭（當時通稱下女）並非生活富裕，實情是母親也外出工作，在台北女師訓導處任職，家務需人照料。而且僱傭工資低廉，較公教人員收入相差甚大。以這年五月為準，台北市區公所一般職員月薪約在台幣兩千元上下，僱一名住家下女月付三百元，只在白天通勤還可少些。

這一年，我們常見本地人穿著戰時日本的草綠色國防服衣褲，足登木屐，街頭巷尾咯噠聲不斷。我們內地來的，多是帶來的舊衣服。倒是日僑遣回前，賤賣不少東西，填充各家的不足。很多家庭的矮桌、坐墊、碗盤瓷器，甚至收音機、腳踏車，都是這樣來的。記憶中，腳踏車輪胎是用廢汽車輪胎改製的實心硬胎。收音機如果真空管壞了，很難配補。燈泡、水龍頭、水管、玻璃，價高貨少，難怪父親和同事們，選宿舍要以這些為參考準據。

手錶連大學生也大都沒有，我是到四年後，師院畢業，任教台南師範，必須要用，才把第二個月全月薪水，買了一隻接近最低價位的手錶，瑞士製，那時只有瑞士手錶。師院第一年，同學們最必需的貴重品，是一隻普普通通的自來水筆。

交通壅塞、空氣污染、聚眾喧囂、政治噪音，這些今日的都市亂象，那一年中在我接觸的這一隅，都沒見過、聽過。連政府的政令或文宣看板、海報，也不多見。

巡邏警車，交通警察很少出現，似乎沒甚麼交通可指揮，沒甚麼治安需要隨時機動處理。小派出所一兩名警察，閒閒呆著。根據記錄，這一年台北市大小汽車包括吉普車全年肇事案只有三十五件。也沒什麼重大犯罪事件，百分之九十是竊盜案，大部分發生在

下半年，最初幾個月差不多是夜不閉戶。貪污之風已盛，被舉發出來的不多。

戶政滿鬆散，沒人上門查戶口。內地來台，何時去報戶口任便。經過抗戰八年分崩離析，來自大陸各地人士身份背景相關資料雜亂殘缺，無從辨認。報戶口時，多憑口述，而且不限本人，親友都可代報，不需查證。有些被代報者誤填，有些蓄意改換，再加和戶口登記人員溝通疏漏，錯誤失實，花樣多多。如我妻兄托他舅舅代報戶口，結果年齡大了八歲，父親名字漏了一字。我則出於父親「遠見」，報大三歲，準備越過整個高中階段進入大學。有一位同船來台的年輕人，用別人證件報考大學，姓名全改了。

醫療也不普及，我們一家四口一年中都沒去過醫院，可能是都沒大病。母親生個小弟弟，是在家裡請助產士接生。小弟弟生後半月患病，送附近小兒科醫生診斷，說是感冒，注射一針，帶藥回家。第二天病情更重，才斷定是氣管炎，已救治不及而夭折。

藥物奇缺，稍特別一點的藥，都是由大陸轉來的外國貨，而且時常供應不繼。

光復不久就來臺灣的外省人，大致可分兩種背景：從政府抗日後方來的，屬於接收階級，除少數首長級外，大多來自對岸的福建，尤其是閩南，他們語言和台胞相通，工作和生活上都很便利。他們離故鄉距離較近，似乎較有長留台灣的規畫。

來自淪陷日本佔領地區的，多是為謀就業棲身。日本佔領後期淪陷區工作難找，真個斯文掃地，知識份子就業機會和待遇遠不及有勞動能力的。勝利復員，一切以來自後方的優先，原在淪陷區

的，工作機會更少了。他們來台多半是想暫時住一段時間，等到家鄉或大陸其他地方有適當機會再回去。也沒有誰料到兩岸隔絕長達四十年，是抗戰八年的五倍。這一批人在勝利復員熱潮中被冷漠、忽視，淡淡地掩沒了。到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他們雖然沒深受歧視，卻在大舉湧入的人潮中，又一次在不受重視下不經意地被掩沒，除了我們少小的和少數際遇好的。

在動亂中飽受奔逃、失業、貧困折磨的人們，似乎也失去了志望和願景。父親往來的外省朋友，日常談起，多抱但求平順小康、安居度日心態。對孩子，只希望安份讀書，早早有個著落。像我，父親只盼快快大學畢業，不管越級多少，免得再蹈戰亂中學業時續時輟覆轍。事實上，當時讀大學的並不普遍，很多人連高中、國中都沒讀到。

另有少數流動商人，有的是來尋覓可以暴發的商機，有的是兩岸買賣私貨，所謂跑單幫，懷有來台長遠創業動機者可能不多。和我們同船來台的李先生，應屬前一類投機客，他找到紫藤廬那所房大院寬的住宅，布置華麗。隨後接妻女來台，他的夫人看來是交際場合熟手，夫妻日常賓客盈門。據說他們的女兒是收養來的，李夫人有意培養她將來傳承衣鉢。

平日接觸的本地商家，對我們這些外來人，似乎還在觀察和觀望，他們的希望與想法，我們無從揣測。我們一家從七七事變以後顛沛流離，到處都是他鄉來客，對當地人疏遠隔閡的異樣眼光，已很習慣。

在下女眼中，我們可能只是換了一個來處的外地人，和日本人

語言習慣不同而已，或許我們這些後來的外地人不及原先在台日本人威權有序，得來的「敬畏」，或許更少些「敬」的成分，若換用「畏服」一詞，也許少了些「服」。

我接觸到的這一批曾在日本佔領區住過的人，他們在勝利復員後，求職不得，半無奈地到台灣謀生，那會有甚麼優越感，更談不上「立威」了。

街頭看不到日本人，一般未留用的都集中待命送走，最後一批日僑在這年四月二十六日遣返。留用日僑連家屬約兩萬六千人。我們家對門鄰居，是一對日本母女和一位內地來的單身漢分住，據說是那內地單身漢接收了這所住宅後，同意原住日籍女眷暫時留下續住。在一個屋頂下生活久了，兩個年輕人有了感情。後來，日本女兒嫁給那位內地人，婚後不久日本母親還是回國去了。這對異國鴛鴦生了兩個兒子，幾年後離婚，日本女郎返回日本。

開頭幾個月，接觸的本地朋友不多，除了父親學校的同事、工友，就是常往來的店家。店裡的人對我們禮貌客氣中帶點生疏距離，交談是國、台（閩南話）、日三語混合外加手勢，彼此難作深入溝通。有些內地來的朋友，他們帶有家鄉音的國語，南腔北調，更增困難。我們在淪陷區時，心裡排斥日本，學校有日語課，存心不好好學。到台灣竟然要用日語和同胞溝通，頗覺尷尬。

另一種尷尬的是在大陸那麼不喜歡日本人，到了台灣竟住日式房屋，睡榻榻米，使用不少日式器具，看到滿街日式草綠色褲裝，聽到咯噔的木屐聲，實在不太習慣。

九月師院開學，雖然不過四百多名學生，再加一百多位教職員

工，總算讓我感到重返人群。同學之間受語言限制，本地外來的區隔，自然地在日常往來相聚中顯出。外省來台同學，也有各自方言，到台灣求學的，「普通話」一定能通。

老師說南腔北調普通話的倒是不少，有些連外省學生都難聽懂。除了教國音的許世瑛等幾位老師，外省籍教授沒幾個國語純正。本省籍教國音的陳蔡煉昌老師一口標準國語，聽得出是日據時代專業訓練出來的。體育老師楊基榮戰後從東北返台，國語純熟，我這黑龍江人卻聽得出他腔調中的東北味。

師院是新創的，沒有日據時代教職員的留用問題，教師中仍免不了有國語不行需要輔以日語教學的，這類老師多在數理生化和藝能科系。

快到年尾，師院師生合作籌備演出話劇曹禺的「日出」，一大堆演員，能講標準國語的也只有黃肅秋、孫藝秋老師（孫在和師院同一校址的高級中學任教，為「日出」執導，也參加演出），女主角吳燕生（她是音樂科學生，本省籍，但在北京長大）和我等幾人，其他都是雜七雜八的普通話。

仔細回想那個年代的中國，何曾有甚麼統一國語，我只在青島的小學接受過以注音符號為準的教學，其他都是不同腔調的普通話。師院為培養師資，把國語、國音都列必修課程，另設國文、國音及英文標準考試，不能通過不得畢業。國語、國音連外省同學也頭痛不已。

記得上許世瑛老師的國音課，三、四個系合班，約四、五十人，只有我和英語系女生齊永培（她父親是國音專家齊鐵恨，她是柏楊

原配，後來離異）受過充分國音訓練，在師院上國音課已無可再學。其他同學多是進大學才開始學國音，非常吃力。其實許老師原籍浙江，北京長大，道地的京音京腔。注音符號卻不是從小學起，教我們國音有時會頓挫一下，他會看看我或齊永培，如果我們沒笑，他才繼續唸下去。許老師只是注音符號不夠純熟，國音教得很好，國語文法更是他的專長，他的醇厚長者之風，令人懷念。

師院為了訓練工友說國語，我被選義務老師。論條件，齊永培應該比我更合適，猜想因為她是女性，院方有些考慮。十多年後，在師大校園偶爾遇到我教過的工友，他們和我談天，腔調還是不順。當然，這已是多年在工作環境中磨練出來的，功過都和我無關。

入學師範學院之前，我面對面較長交往的只有三、四位中青少年朋友。

指著七層高樓向我發問的陳姓少年，是暫住徐州街時在住所對面空地（現在已是台大法學院學生宿舍）閒蕩時遇到。在那空地我先已盤桓了幾天，極少有人。他是我看到的第一個年輕人，他竟然會說一些國語，就此攀交。他大我兩三歲，這般年紀雙方不會刨根究柢，語言也有障礙，多在空地談談動動，頂多穿過新公園到附近街頭逛逛。那一地帶當時很少有人走動，更沒有其他兒童和少年出現。我們稍有語言和環境背景知識的隔閡，並不影響溝通的熱忱，他斷斷續續問我不少問題，想來他對我這外來人和同祖源的大陸環境好奇也想探究。我們相處一個多月，只是出於少年人交往的興趣，不懂得交換住址，到我搬家後就失去連絡，幾十年後連他名字都忘了。

紫藤廬的李小姐，和我在她家客廳一起聽老師教課一個多月。上課前點點頭打個招呼，下課後說聲再見，似乎沒談過課外的話，休說交往。以她父母的培養目標，也不會任她們女兒輕易和男孩多接觸。這年秋天，她插班台北二女中，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她們全家避回大陸。李小姐亭亭玉立，比那時的我還高些，人很娟秀。不知她是否確曾如李先生夫婦安排，風靡交際舞台，以她看來溫良文靜的性格，在動盪的時代以投機為手段的養父母攜帶之下，際遇難測。無論如何，如今已應是七十多歲的老祖母了。

多年後，懷著追憶少年時代的情愫我到紫藤廬探訪，看到它被標榜為「無何有之鄉」，是「靜靜地蘊藏著生命與創造原的地方，也是真正能得到休息與安寧的地方」。雖然這都因後來大批自由主義和民主運動人士在此常聚增添的附加意義，對我這在紫藤廬「史前」就登堂入室過的人，也不免對廬內揭示的：「什麼都沒有，又好像什麼都有」興起更多的感觸。

父親曾安排讓我學日語，找到兩位和我以國語互換教學的。一位是台北師範留用的日本教師國分直一，一位是台大醫學院助教劉沼光。

國分直一是台灣史前黑陶文化研究者，相處不到半年，他還是被遣送回日。國分大我二、三十歲，體型瘦小，比我矮半個頭。和藹謙虛，親切又彬彬有禮，和我在上海淪陷區看到那些日本人跋扈蠻橫，大不相同。他學中國話很認真，邊聽邊記，用日文加註發音重音。雙語互教，我的日語沒學多少，不是他取巧，是我沒有他那樣積極主動。半個多世紀之後，他曾應台大邀請來台，不巧我人在

美國，未能再聚，也無法測知他的中國話有無進步。令我至今不忘的，是他那股認真求全的熱誠。明知沒有多久就會被遣返日本，他仍然為教學而學習。如果我有他那股精神，應該日語和閩南語都可以學通。他的謙遜溫文風格，在教學上是優良的條件，他送給我幾本他研究石器時代台灣「有肩石斧」的報告，我留存至今，慚愧的是我的日文程度始終未達到能讀通的水準。

另一位二十多歲和我相互教國日語的劉沼光（應該就是傳說涉及李登輝總統參加共黨活動的那位），他比國分高一個頭，瀟灑開朗。他在台大工作，一定有學習國語的一般管道，他已會說一些國語，找我互教，可能是想加速多學說得更純正。他盡量多說國語，我的日語進展更少了。回想父親並未安排我去學台語，顯然認為不很必要，的確當時在外，一看我們臉孔穿著，本地商人就以國語字詞夾雜表情手勢或用日語溝通。

劉沼光的學習態度也非常認真，和國分一樣都是義務交換教學，每次上課都準時到達，主動發問，隨時筆記。

和劉沼光互教約有兩個多月，也都是他來我家。其間沒有談過任何政治話題，是我年紀嫌小，還是他有所保留？其實像我這樣在淪陷區成長的十五歲少年，從家庭到學校都聽不到政黨話題，對國民黨執政的情況和共產黨的活動了解有限。

我和劉沼光年齡距離不大，課外相談歡洽，如今回思，實難想像他會熱衷投入政黨活動。後來他在竹北祖居舉行傳統婚禮，我去觀禮。那是我離開台北第一次最遠的旅程，也是生平第一次參加舊式婚禮，印象深刻。劉沼光婚後我還去過他台北住所，劉夫人是受日本教育的知識女性，溫婉美麗。

到了台灣幾個月，沒怎麼想到大陸，像我那樣年紀從小緊跟著父母多半只注意眼前。這一年裡，也沒什麼能引起一般民眾注意的大陸團體來台。由於喜歡話劇，對這年底從上海來台演出的新中國劇社我倒頗感興趣。這劇團由名戲劇家歐陽予倩領導，在台北中山堂演出「鄭成功」等劇。」

台北這一隅，將近一年中，聽不到交通、人群、商業活動和政治活動的噪音，看不到我們時空能接觸以外的人間、世界；我們像是在一個隅角「蠕動」。在傳播媒體還沒普及的時代，大多數人都是如此。

一切一切，顯得徐緩、靜滯、平淡、空蕩，隱藏下的緊張、不滿、悸動，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

令人感覺像無風無雨的清晨，天空和地面都是明淨的，卻看不到陽光，也嗅不出多少朝氣。

就我十五歲年齡，活動地區接觸範圍有限，片面認識這一隅臺北，只留下這種程度的印象。

六十多年前的臺北，當然不止如此。隨手轉錄這年五月新生報副刊林飛隼一篇「寶島生活散記」中一段「台北即景」短文，稍作對比：

「由早晨到深夜，每個人的耳朵裡沒得清靜過；火車汽笛嘯聲，汽車馬達怒吼，工場裡的發動機，街上行人的木拖鞋，小販的叫賣，商號裡的收音機，茶樓酒館裡傳出來的調笑聲，盲目的按摩匠們悲哀的笛子，交織成混雜的人籟，吵得不亦樂乎！

「馬路上揚著灰塵，散播在行人的眼睛上，小食攤的食品上，住宅的家具上，機關的辦公桌上，成為灰塵世界。明溝裡流著污水，

瘡蚊的幼蟲大量寄生著，一陣一陣的香風飄，叫人們會聯想到女店員的，滿佈着蚊子咬過的傷痕的小腿來（顯然林飛隼先生當時還不知道用「紅豆冰」形容這樣的腿痕——驢伸註）。

「甫經解放的下女已不再勤于草蓆的清潔了，跳蚤和「南京虫」（日本人別稱臭蟲隱含貶抑華人意味——驢伸註）在新的環境裡大出風頭

「抽水馬桶時常不通，然而『後來距上』的人們還是一樣的方便如也，其結果是『黃金山積』。相反的是自來水龍頭常常解放着，任他晝夜長流。

「火車站裡雖然還在排隊，到底是排得有些走樣；車裡也太破爛，墊子好多都露了骨了。」

這樣的「台北即景」，當時的我是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文中報導的那些場所，也是我還接觸不到的。

同樣，當時在這一隅內活動的，諸如已在台大就讀的李登輝、彭明敏、辜寬敏，誰又能料到多年後會成為叱吒風雲的人物。

撫今追昔，一九四六年的台灣很少被提到。休說大風大浪的一九四九，就連前一年一九四五有台灣光復，後一年一九四七有二二八事件，而一九四六年的台灣波濤起伏不大，似乎影象模糊、被淡忘了。事實上，二二八的民怨，大都是在這一年累積的；以後的學運、民主運動、省籍意識糾結也多以這一年為潛在的醞釀源頭。不過，就是談到也只是零零星星、斷斷缺缺。究竟相隔太久——一九四六年到現在，比日本佔據台灣時間還要多上十三年。此刻談當時，猶如在台灣光復之日談起馬關條約台灣割讓前十多年事，遠比白頭宮女話當年多上幾倍。

六十年的台北大學生

大學和大學生是觀察時代環境很重要的多面鏡體的一角。

六十年，就人類社會說，是變化滿多的時間距離。

六十年前是民國三十九年，更上一個六十年前是一八九〇

——清光緒十六年，還在科舉時代，

舊制的京師大學堂都尚未成立。

一張張全身學士服的畢業照，偶爾有幾張袍角下露出牛仔褲或球鞋，從照片上乍看起來，不會想到他們是六十年前台北的大學生。

那時的牛仔褲是真正美國海軍水手服，流通到市上。身價不賡，穿得起的不多，而且多是男生。女生大多是過膝長裙、連身裙，也有人穿直桶型旗袍（俗稱大褂）。一般男生普遍的是襯衫、卡其布長褲。

民國三十九年，台灣只有台北的台灣大學、師範學院，和台中農學院、台南工學院，從北到南共四所大學，這一批大學畢業生，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後，僅有的能較為安定、完整求學，而且順利畢業的幸運兒。同時期進入大陸各地大學的男女青年，都在學潮、內戰的混亂中度過三年，最後歸入中共統治下。

推前兩年——民國三十七年，是台灣這批畢業生大學生活明顯的分水嶺。

前兩年，台灣處於戰後及光復初期，百廢待舉，而中央政府無力也無心着力照料，台灣四所大學學生和資深教授不足。後兩年，政府逐步遷台，人力、財力、經營力何止倍增，大學情況驟變。

就學生說，前兩年，是以本地日制中學畢業生和返國插班的台籍留日學生為基幹，大陸來台求學的，是抗戰勝利後，飄散全國學生潮中的一小部分。後兩年，增添了由於政權版圖更易的狂濤、以倒海之勢沖流到這還能維持原有意識形態的一隅之地的一大股人。

就師資說，更是巨浪席捲來一大批菁英。

前此自由卻散漫的校園：壁報、海報、大型漫畫（師院中庭走廊壁報板上膾炙人口的一副漫畫：教授面對黑板大字寫出「三民主」，「義」字才到一半；第一排課桌椅，一個學生埋頭小睡，一個學生面對窗外，一張課桌上放着一頂學生帽，此外別無他人。）師生同學之間的言論、隨心所欲（台大壁報一首打油詩，諷刺某位院長在校方配供院長三輪包車車背大字漆書「台大×學院長×」，其中名句「風頭出盡三輪尾」。）罷課、遊行抗議（師院學生請願改制大學，聚眾在校門口堵住由南京來台在校內視察的教育部長朱家驊，校方只好把部長從後巷小門送走。）幾乎是每月一現。

「二二八」事件，大學生涉入者不多。三十八年的「四六」事件，則是大學學潮的高峰。

對我們影響較深的是，圖書館的書原本尚未設限。喜愛文藝的，借閱的大都是三十年代的小說、詩、戲劇，大部分是左翼作家所著，魯迅、巴金、杭約赫、曹禺、田漢等的作品，充分流通。翻譯作品以蘇俄原著居多，高爾基、蕭洛霍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戲劇到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理論，都自由借閱。馬克斯的「資本論大綱」、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我都從學校圖書館借過。這類作品，甚至連只是譯者或出版者左傾的，在民國三十八年「四六」學潮之後，都從各校圖書館消失。後續入學的大學生除了曾在中學讀過，此後至少二十年以上在台灣接觸不到這些作品。「四六」之後，我參加的「師院戲劇之友社」排演曹禺名劇「雷雨」，我這個「社長」被訓導處找去，「善意」警告：「你們這樣做，是為匪張目。」

雖然廣播一枝「略」秀，報紙也曾有過十多家；在艱困的經濟大環境下，經營和消費雙方都力道不足，大學生對媒體冷漠而疏遠，以致對時局隔膜，與現實社會互動也熱絡不起來。部分學生較常看電影，男女生交遊，電影院是最常去處。看完影片印象隨之淡出，沒有媒體渲染鼓吹，「影迷」風氣也掀不起來。

三十七、八年間，台北市唯一可以點選古典音樂的「朝風」咖啡館，是我們一些熱愛文學藝術的年輕人的聚會所。到那裡的人，是為音樂，它的咖啡平平。只有一架手搖唱機、不會超過一百張老舊唱片，卻是除了收音機之外，僅有的欣賞古典音樂管道。

大學生來自全省城鄉和大陸天南地北，年齡參差，背景懸殊，交往來自球友、棋友、宿舍鄰友……。

同班之誼，要等一兩年後，才慢慢加濃。烤肉、郊遊、野餐，尚未流行，大家手頭拮据是原因之一。舞會更不必說，社交舞不受校方鼓勵，校外邀同學舉辦，校方獲知，也有麻煩。而且，會跳上幾步的，也沒幾個人，他們有自己的去處，不必邀聚同學。

台大、師院之間，老同學、老朋友不少，甚至有人跨讀兩校，都有學籍。兩校社團中，「台大話劇社」和「師院戲劇之友社」往來較多；「麥浪歌詠隊」以台大為主，隊員也有師院學生，「四六」事件中，「麥浪」隊員受牽連的很多。

校外活動，知之不詳。就我個人也曾參與的，以新生報副刊「橋」主編歌雷（本名史習枚，和聯合報系元老劉昌平、馬克任是復旦大學新聞系同學）帶動的文藝活動，薈聚的大學生最多。後來，受「四六」事件牽連，歌雷入獄，「橋」也停刊。

三十六年底，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舉辦了一次「戲劇講習班」，其中將近半數是大學生，以話劇藝術為研討主題，講師涵括戲劇、電影及其他藝文界人士。這班同學有些散到戲劇界和學校劇運，但有些講師後來涉入白色恐怖。主講電影的白克被處死刑，主講詩歌朗誦的雷石榆和主講閩南語話劇的陳大禹逃亡大陸，主講舞蹈藝術的蔡瑞月是雷石榆的夫人、受牽連被囚禁綠島三年。

除了捲入學潮，大學校園內一般同學步調平徐。沒有電視吸引，也沒有手機牽制；大學四年中，學生很少打過電話，打給誰，誰有私人電話。校園、街上，目光所及看不到甚麼彩色繽紛撼動心弦的人、事、景、物。

更重要的是，沒有無窮無盡的新聞、廣告剝奪時間，攪動心緒。

從講堂獲得的知識，很少連結到實質的利益——除非博取高分也算是。那時的大學與社會尚還疏離，各種企業很少寄望有大學生加入。連新聞界都不重視學歷背景，大學也不把新聞事業放在眼下，台大校長傅斯年斷然拒絕設立新聞系。事實上，大學在那時並不熱門，冷科系真的門可羅雀，比我晚一級的師院數學系只有一名畢業生，台大心理系有一個年級沒有學生。

複雜的學生來源形成紛歧的學生心情。

人數居多的本地同學，爭取到比日治時代增多的深造機會，期待著台灣人自己的主體環境到來，為本鄉本土發展努力。

三十五、六年隨家或個人來台就學的學生，是隨緣培育自己，期盼返鄉有日。

另有少數，原有工作，半工半讀。還有一些是國共兩黨的職業學生，他們有些已曾在大陸大學就讀，遷轉來台。其中還有本省籍學生到大陸讀一兩年大學，轉回台灣；「四六」學運事件後，再潛返大陸，嗣後出任中共要職的師院同學鄭鴻溪就是其中之一。

民國三十七年開始，大陸政軍民商陸續湧入，學生來源驟增。除了軍公教人員和一般民眾子弟而外，還有流亡學生、退役官兵。入學方式形形色色，有大一新生、轉學生、插班生、寄讀生，還有附讀生。尤其是台大，外省籍學生人數，大量增加。台大校方統計，民國三十五年到三十八年間入學學生省籍，本省籍百分之五十八點一，外省籍百分之四十一點九；文學院的外省籍學生，占百分之七十二點九。

混亂的時局加上崩潰的經濟，交織著紛歧背景的學生，使大學校園陷入煩囂惶亂。面對極不穩定的現實生活，險而難測的未來；大學生不知何去何從，無從安定生活，更無法安心向學，對前途更不知如何期待。

這一段波動的日子因三十八年兩岸政權對峙之局確定，和這一年實施的新台幣改制，逐漸緩和，終於形式和表面上落實了

劇烈動盪的時代與生活，是年輕人磨鍊與激勵的機會。這幾年的大學生裡，

雖然成份紛歧、龍蛇混雜，卻也臥虎藏龍、人才輩出。前期早幾年的有政壇領袖人物如台大的李登輝、彭明敏、辜寬敏。較後晚入學的在師院多藝術家如楊英風、史唯亮、許常惠、李子達（李行）；台大則以學術界居多，後來當選院士的李亦園、許倬雲、錢煦等人都是三十七、八年間考進台大。台大醫學院培養出來的前輩名醫，那是不勝「列」舉了。

同學之間，經驗背景與年齡懸殊。有些已有相當專業經歷或超逾學歷，再回校園。年齡更是差距很大。

在此之前，大陸尚未普及教育、城鄉教育水準不一，十幾歲才入小學的也有。來台就學的，又很少是應屆的高中畢業生。本省雖在日據時代國民教育已頗普遍，能繼續高中、高職階段教育的機會不多，進大學極難。光復初期，台灣這四所大學，入學的涵括廣闊的年齡層。我是在抗戰期間隨家顛沛，因先父身任教職，重視子女學業，戰亂遷徙中，反使我能不斷越級就學，所以我在實際年齡十五歲半就進入師範學院。不但是同年級最幼，很多低年級同學比

我還大，有學弟妹戲稱我「學長老弟」。同學中，有人的兒女比我年紀還大。

比對六十年前後大學校園和學生生活，實質已多變易，但有些形式上尚還依稀的。學生身上的卡其褲、牛仔褲，腳上的球鞋。教室裡的排排坐課桌椅、黑板（多已換成白板）、講台。教授一廂情願地獨白，學生人在心不在地神遊（當然不是通例）。規律的上下課鐘聲，只是多已換成電鈴，而且是錄音播放的。制式的畢業典禮和畢業證書，都沒多大改變。

相應代換的：鉛筆、沾水筆尖鋼筆、自來水筆——原子筆、電腦。蠟紙油印——影印、電腦列印。土產腳踏車、進口腳踏車——摩托車、汽車。

當年想像不到的：手機、信用卡和今日的國家社會生態

大學生當 Showgirl，太匪夷所思，何來 Show 的場所，也無此行業。戴粹倫當主任，師院音樂系學生只可在本系正式音樂會演唱、演奏，在校內一般同樂會表演，都不准許。

在那百業蕭條時代，大學生極少打工機會，除非原有職業，自動進修。似乎只有藝術系同學替片商畫過電影海報（沒有能印海報的工廠，都是用人工一張張去畫），他們不是以畫家身分設計作畫，是比照畫工、甚至是學徒待遇，去一張張臨摹放大。

家庭教師輪不到大學生，那時沒有升學競爭，很少有人聘請家教。我曾和日籍考古學家國分直一教授，和後來涉入共黨嫌疑的台大醫學院助教劉沼光以國日、國台語互教，是義務交換，我只白吃過他們餽贈的糖果點心，算不上家教，而且是光復剛過半年的事。

報刊寫稿，名家出過詩人林亨泰（和我同屆師院教育系）、散文家葉慶炳（筆名青木，台大中文系）、林良（筆名子敏、師院國語科）等。其他我所知常寫散文或雜文的台大政治系孫達人、邱媽寅，師院英語系蔡德本、黃昆彬、耿發揚（筆名艾火，後任聯合報編輯）、國文系毛文昌（筆名小兵，後任中央日報地方記者）和我自己（筆名馬冀、吉森），人數可能不少，但都沒成大家。

那一代大學生，後來轉入新聞傳播界的至少有：台大的李文中（台視早期的新聞部經理）、李子堅（先任自立晚報記者，後赴美進入紐約時報），師院的劉其英（中廣）、杜兆楠（中廣、民生）、李行也和二哥子堅一樣在自立晚報當過記者。

三九級台灣四所大學的畢業生，象徵光復後台灣高等教育的第一批成果，政府特別舉辦就業講習班，一方面為國民黨羅致寵絡，一方面輔導就業。預備軍官訓練始於四十一年，我們同屆除了逾齡的大都陸續服四個月國民兵役，只有我這樣年紀的需服兩年常備兵役，我因在台南師範任教，可能是當時唯一要入伍的大學生常備兵，兵役處難以安排，勸我借調南師附小准予緩召。師院畢業生全面分發中等學校任教，四、五十年代，台灣高初中學生包括總統級人物，都可能被其中一、二人教過。其他三所大學畢業生，大致都獲得推荐安排就業，除非不想接受，沒有失業問題。

就業雖然穩定，但對岸中共軍事威脅，台灣經濟壓力，都看不出有何突破困境的跡象。展望未來，前途茫茫。

這一群大學生就這樣投入社會。

大學四年，往事真已如雲，朦朧疎散，聚攏不出多少清晰的舊

影。偶或出現我回憶中的，似乎只有師院校園那古老的鐘聲。我家距學校很近，聽到預備鐘響，還來得及趕上朝會。大三頭幾個月，兩三個知己好友一時心血來潮，相約二十年後如何如何。不久各自西東，你出國、他回大陸，隔洋、隔海、隔了歲月和滄桑，約期淡淡滑過。如今拾回記憶，已是一個、兩個、三個二十年，難道還會有第四個二十年？

六十年來，精神和物質環境改變了很多，大學生活也改變了很多。但也有些改變不了或沒有改變的。

六十年來，或許還繼續若干年後，最沒有改變的是因應大學生涯的原則：不要過於寄望它、依賴它，否則你可能很失望；也不要過於輕忽它、空耗它，否則你一定失落許多。

那些沒有「樓地板」的日子

「肉價、菜價，都漲了！」

「樓地板敲定了！」

第一句，是前幾天一位中低收入家庭主婦的感喟。

第二句，是針對紛爭多日的那個年改議題，不同心情的共同的無聲結語。

這兩句感喟和結語，把我迴蕩多日的回溯視點，從藝文動態轉移到大眾生活。

仍然是我原所聚焦的那個年代——民國三十八年前後。

那是一個多次「三月不知肉價」的年代。

那是一個沒有「樓地板」的年代。

那個年代的某一天，我注視著剛從台灣廣播電台領到的車馬費，封袋上數字是四十元，上個月是一百六十萬元。雖然心中早已有數，感覺上還是有些難以適應。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新台幣發行，以一對四萬取代舊台幣，暫時遏止二次大戰以來台灣民眾通貨膨脹的嚴重危機感。

撇開日據時代不說，單只光復後不到四年之間，舊台幣發行額從三十億增加到五千兩百七十多億，另外還有一兆兩千一百多億的即期定額本票在市面流通。當然，那些日子是戰後的非常時期。二戰結束前日本已挖空搾乾得差不多的台灣，由國民政府在倉促中草

率接收。抗戰勝利的時間點是意外的提前，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既無心理準備，也實在沒有一下子全面「重整舊山河」的能力。第一批接收人員形同空手前來，就地沒多少「材」可取，中央也無力支援。

嚴重的先天不足、生產停滯，再加國共內戰、大陸通貨膨脹影響，台灣陷入貧困匱缺。

單從我日常接觸的台北一隅，所見所聞：

我居住在師院、台大之間的日治時代教師宿舍區，搬進之初，四周處處空宅。和先父一起前往挑選北師指定配住房屋的教師群，大家一致抉擇的優先條件是：紙門、玻璃窗、榻榻米完整，水龍頭、燈頭齊全，坪數大小並不在意。

我家住進基地六十坪、三十多個榻榻米的日式住宅，父母弟弟和我，四個人享受了一年多的寬闊。大陸共軍氣焰日盛，我的故鄉東北赤化大半，一批批有「遠見」的老家親戚奔向台灣，台北是過渡第一站，我家的榻榻米提供他們棲身幾個禮拜到一兩個月，有時兩三家撞期，幾乎每片榻榻米都分到一人。而且、這股親潮川流不息，持續一年以上。累積人次，想必過百。並非我家特別慷慨好客，那一兩年有大陸親友的家庭大都如此。

定居那宿舍區頭一年，我家四周只有一兩個小雜貨店，順帶賣青菜、豆腐、蛋類。最近距離有生鮮魚肉的獨家店鋪，在今日的南昌街、寧波西街路口。七十多年後，我還能記得這一店址，其實連那店貌都依稀浮現眼前，是因為那時候我每一兩個月要來回步行一個小時以上，前往採購一次。公車大約一小時一班。

我家沒有冰箱（指以人造冰塊封凍存物的 冰箱），除非能自行醃製，生鮮魚肉大致只供上桌一兩天而已。我父母分別在北師、女師任教，兩位教師收入，加上我通學可領回師院公費公糧，似乎也得幾個星期不問肉價罷，推想大部分鄰居也是這樣。接近新台幣改制之前，師院住宿同學的餐盤中，油豆腐已算是最好的主菜了。

物價飛騰，光復到三十五年底，一年多物價上漲約近一百倍，幣值日貶，準確地說是時貶，黃金白銀較可信賴。在那人心惶惶的日子，袁大頭、孫小頭黑市交易湧現路邊，買者非為儲蓄投資，只是爭取短暫幾天的保值。「銀牛」滿街走，我曾在衡陽路上掃瞄到幾個手握銀元兜售的熟面孔，竟然是些中學老師和薦尾委頭級的公務員。

新台幣登場，是國民政府全面撤離大陸必須鞏固台灣作為最後生存基地，在幣制上一個指標宣示性的表現。有各種政經配套措施以及國際環境的扶持，確實給台灣民眾獲得幾年「穩定的克難」生活，對歷經將近二十年戰亂和戰後混沌復甦期猶能存活下來的人們，大多數是雖不滿意尚可接受。

那時還沒流出「樓地板」這樣名詞，但久亂思安的大眾內心的確渴望有這類的可靠指標，新台幣似乎有點這樣象徵。

民國三十九年——新台幣改制第二年，我師院畢業，分發到台南師範、專任教師，月薪二百元。曾以一個月薪水買了生平第一隻手錶（約當今日四、五千元的等級），分期一年多買到物資局配售給公教人員的腳踏車（Phillip 牌）。

十年後，我在台北成功中學任教，月薪約增為七、八百元，購買力反較前降低。先父過世，我承擔母親兩個幼弟一家生計，額外再兼一個國中專任時數教課，兩份薪水只支撐一個星期餐桌出現不到一次魚肉的日常生活，而且寅吃卯糧，每到發薪前幾天母親就得向熟識店家賒欠取物。女朋友來訪，經常遇上空心菜掛帥的晚餐，偶或靈犀相通，她會帶兩三隻女生宿舍附近小吃攤的滷鴨頭給全家加菜。

再過十年，任職中央通訊社主任級，月薪較前增約兩倍，台灣經濟業已起飛，進出口貿易流暢，薪水階級也有幸淺嚐現代化生活滋味。從此生活步入安定平順。

大學畢業四十年，我以加功俸級從師大教職退休，核定的退休月俸是兩萬四千餘元（另加公保退休給付優利存儲利息一萬三千餘元）。其後數度調整，如今月領退休俸四萬五千餘元。

半個多世紀薪資金額相差兩百多倍，看來新台幣的「樓地板」指標浮動甚大。

雖非「百無一用」是書生，所學如我，除了公教圈，似乎遇不上什麼合適的穩定工作。在台灣幾近一生，小有起伏的生涯，無怨無悔。

抗戰八年，前四年在上有炸彈、後有炮彈的逃難潮中顛簸，後四年困窘在上海的日本佔領區。八歲時看到父母抱走沒多久還細聲喊我大哥的可愛小妹，說是出外就醫，從此永別。多年後才知道那時是寄居友家，不得不把病危的小妹帶到街上等候斷氣，再草草收埋。看到過不少路邊垂垂待斃的僵臥老少，我警覺地深記住在齊齊哈爾外婆家的門牌號碼，那是我所知的唯一可能固定未變至親的通

訊地址，我設想萬一我父母出了意外，可呼救有門。

十三歲那一年，二戰已到末期，上海已陷混亂，我從初二停學到一家貿易公司當練習生，一月所得領取一張很難拆現的本票，只夠向同棟大樓樓梯間的包飯商交換一個多月的午餐——一盤沒有肉的肉湯蓋飯，那已勝過家裡不是純米、無油粗菜的晚餐了。更使我記憶甚深的是我那勉強可稱少年的童工，常蒙會計小姐授以重任，揹著一大麻袋鈔票到銀行送存。而且，每次會計小姐都會另交我一小袋散鈔，備供銀行點收有缺時遞補。似乎銀行收款從未細點，我總是原封交還，會計小姐隨手丟置一邊如儀。

相對過去，在台灣七十多年，我真心惜福。我也願有一個可靠「樓地板」的日子，但我從歷史上、從我個人經歷上搜索，大環境動盪影響「樓地板」的地基，「樓地板」不可能長期敲定在一個不變的數值點。

完稿時刻，已近七月七日午夜。八十年前此日我在青島市，父親是當地太平路小學校長，我是一年級學生，學校面臨海濱，現代化校舍，不遜於目前台灣任何國小。依稀印象，我家是鋪「地板」的小洋房，我戴過剛開始流行的航空皮帽，皮鞋是瑞典製，端午節各色粽子堆滿。應該是節後不到一個月，蘆溝橋烽火燃起，河山和我們的生活一起變色了。

日久了，童年生活似真似幻，彷彿是「童話」、是「神話」，一切自然是無法追回。成長後，多年竊望的少戰爭、少動亂、長期安定，甚至於期求不算太高的比較浮動莫太快的類乎「樓地板」的可信賴指標，也貌似「童話」、「神話」那般只可「可望」？！

七十一年一覺戲劇夢

「雷雨」——「齊齊哈爾」，這兩個不太相干的點連接，爆出火花，點燃起我的記憶。

去年報紙一則報導，大陸齊齊哈爾的話劇團來台灣演出曹禺的「雷雨」，我看到時，已是當天晚上，只此一場，我無法趕去，卻激盪了我七十多年來已漸模糊的戲劇夢。

我是九一八事變前半年出生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七七抗戰第二年，在漢口觀賞我記憶中的第一場話劇，就是「雷雨」，「中國旅行劇團」演出，主要演員有唐槐秋飾演周樸園，他女兒唐若青飾四鳳。回想還能出現一些當時舞台上片段場景，但不能確定是真的、或是續後看過多次「雷雨」印象的混淆。

童年生活圈我接觸較多的是平劇，先父在北京讀大學，課餘迷上平劇，我小時候是坐在爸爸腿上的長期免費觀眾。久之，對名角、戲碼、劇情人物知道很多，還被教了一些道白、也能哼上幾段在親友前獻寶。最常唸的道白是「連環套」劇中黃天霸那句：「愚下保鏢，路過馬鞍關口…」，最熟的唱腔是「四郎探母」起首那段：「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可以唱到幕後鐵鏡公主喚出：「丫環吶！帶路！…」前為止。

能記得最早看的一場平劇「法門寺」，主角青衣黃桂秋、花臉金少山（或許記錯，是裘盛戎）。記憶最深的是中場時，突然空襲警報響起，台上唱做立刻停止，全場照明迅速轉黯，劇院裡相當安靜，幾似沒人移動和驚呼噪音。不多時淒厲地緊急警報過後，外界日機俯衝、炸彈落地聲和轟炸震撼，相繼傳來，院內一片沉寂，連咳嗽都沒有。過後解除警報發出，台上鑼鼓立刻響起，原劇接下演唱，觀眾繼續聽戲，沒什麼竊竊交談聲，剛才那場轟炸，彷彿是例行的暫停空白。

那時正處武漢大空戰巔峰，民眾對敵機轟炸已視為日常作息項目之一，熟知如何應對。抗戰八年，前四年我隨家人奔波逃難，後四年淪陷在日本佔領的上海英法租界，兩頭反覆遭逢日本、美國飛機轟炸，也漸麻痺，至今還能回想一點細節的竟是武漢劇院這場轟炸。

我家逃難起自青島，歷經上海、南京、長沙、湘南、武漢、廣州，再由香港轉回上海英租界。珍珠港事變後，成為淪陷區居民。戰爭期間上海平劇仍很活躍，我在父親膝頭免費看戲機會更多。四大名旦的程硯秋、荀慧生，四小名旦的張君秋、毛世來，名鬚生馬連良、譚富英，小生姜妙香、俞振飛，都看過多次。說看戲，是實話。我最感興趣的是林樹森的關公、葉盛章的武丑等戲，但對以莊生夢化蝶為本的那齣「蝴蝶夢」劇情印象頗深。小六作文曾套用名句「人生若夢、夢也像人生」，長大後，明白這可以比擬戲劇濃縮人生、凝聚演員和觀眾幾個小時，彼此夢幻一番，對雙方都是內

在與外在合鳴的享受。

我對平劇是「隨父班附讀」，究竟七八歲幼童領略不出唱腔、身段的藝術韻味。劇情對已生吞活剝看遍父親書架上「三國」「列國」「西遊記」、「聊齋」「水滸」「金玉緣」等等這個早熟小說狂的我，沒多大吸引力。而且我覺得包公、張飛、魯智深都是花臉，孔明、宋江、文天祥一律長鬚遮掉下巴，沒什麼變化，因而未曾「深陷其中」。

抗戰勝利那年，上海蘭心戲院一場「苦幹劇團」演出費穆編導的話劇「秋海棠」，兩位名演員一改戲路，慣演反派的石揮，飾演俊俏名旦秋海棠，唯妙唯肖，劇中一段小生清唱「羅成叫關」台下內行觀眾齊聲爆好。（最近看到一代影后李麗華逝世新聞，想起她和石揮合演過好幾部影片，在「假鳳虛凰」一片裡，石揮飾演女子理髮師，為追求貴客李麗華出盡渾身解數，那副反派嘴臉實難和秋海棠聯想到一起。刻畫劇中人職業習慣，石揮演出一個誇張動作，在假意自殺向李麗華示愛，手舉理髮剃刀先把自己頸上領帶權充磨刀皮，磨擦兩下。這手表演喜劇效果十足，卻引發上海理髮師工會抗議，認為有損理髮師形象。）性格小生張伐扮演袁大帥，滿口山東鄉腔，演活了狂暴粗悍軍閥。這場戲讓我領悟到人生在舞台上台下，可以也可能扮演相當不同的角色，引發我此後的戲劇熱。

三十五年三月來台灣，剛光復半年，百業蕭條。直到一年後才有「新中國劇團」來臺公演歐陽予倩導演的「鄭成功」和「牛郎織女」，曾遴選女師附小一些學生客串戲中童角。接著「觀眾演出公司」多次來台上演「正氣歌」、「清宮外史」、「大觀園」等

話劇，演員有耿震、路曦、陽華、沈陽等，其中很多是南京國立劇專校友，最近逝世的崔小萍，是「觀眾演出公司」最後一次來台演出「寄生草」一劇的女主角，劇團回大陸，她留在台灣。

光復初期，國語尚未普及，一般家庭收入有限，話劇觀眾不多，大陸來臺劇團每次演不了幾場。後來陳大禹創出反映現實生活的多幕劇「香蕉香」，劇中人物各依身分背景說自己方言，國台語都在台上出現，炒起台北話劇熱。

三十六年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第一次話劇演出，由師生合作。劇本是曹禺的「日出」，前台後台大家一起互動，連後來涉入白色恐怖案件被槍決的藝術科老師黃榮燦都來幫我們化妝和裝置佈景。我分配的角色是反派茶房王福升，這次演出應是北部學校第一次的話劇活動，也是我第一次登上舞台。說來有點慚愧，我參加演出並非已有戲劇熱，當時師院本科和專修科一百多名學生中，國語能比上我的不到二、三人（師院國語專修科稍後一年才招生），我是被師長們「按圖索驥」點選的。

「日出」把我從觀眾席推到舞台上，排演、演出，讓我實地體味了戲劇和演員，尤其幕起、強光隔絕台下觀眾，你若真能融入戲裡、嘗試另一個內在外在的人生，是挑戰、是體驗，刺激也新鮮。

「日出」落幕，我向舞台劇跨上一步。

這年暑期，國民黨舉辦戲劇講習班，地點在台北中山堂，我報名參加。講師和課程有：董心銘的「戲劇工作管理」、王紹清的「戲劇概論」、司徒陽、陳春江的「導演」、白克的「電影淺說」、雷石榆的「詩歌朗誦」、雷石榆的夫人蔡瑞月的「舞蹈藝術」，其

他講師還有石叔明、陳大禹等。有一堂課還邀名影星舒適亮相，講些什麼已不記得，那時他已息影在某單位任職，偶爾會在衡陽街附近看到身著深藍色中山裝的他。班友只記得師院晚我一班同學章志先和後來在台北忠孝東路三段開業的國醫張駿，同班似乎沒有女生。

戲劇講習班引發我對戲劇的積極探索，促成我號召同學組織師院第一個話劇團體「戲劇之友社」，也在這一年加入中國廣播公司台灣廣播電台的「台聲劇團」。

為深入研究，一批志趣相投朋友，經常在中山堂附近的朝風咖啡館，邊聽古典音樂邊談戲劇理論和相關文藝名著。蘇俄實驗劇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丹欽柯的「戲劇論」和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三書是長期交談的中心。劇本偏重易卜生、契柯夫、果戈理、歐亨利、曹禺作品，洪深的「戲的唸詞與詩的朗誦」、余上沅、鄭君里等的戲劇實務專著，當作課本。我們還練共鳴發聲、對鏡變臉、柔軟身段，狂熱期還曾想回大陸就讀國立南京劇專。

「戲劇之友社」最先演出的是改編蘇俄果戈理和契柯夫的兩個獨幕劇，有了經驗開始演出多幕劇夏衍的「離離草」。規模最大的一次，是民國三十七年在台北市中山堂，售票公演黃佐臨的喜劇「樑上君子」。

中山堂是當時台灣惟一能演大型舞台劇場所，多次觀賞大陸劇團來台演出，我們都只能坐或活動在台下，連到後台一探的機會都沒有。這次竟然在中山堂演出，大家都很興奮。

中山堂舞台前後空間不廣，搭不出真正深景，我看過多次戲劇演出，佈景遠比不上在上海看過的「秋海棠」。但比之校內禮堂的台面，對我們這些學校劇團演員已夠過癮了。

演出前，裝置舞台、搭佈景，比以前在校內舞台要繁重得多，我們卻樂此不疲，自覺有點接近專業層次的磨鍊。果然真正的考驗來了，檢視布幕起降速度到半空，忽然卡住。我探頭看望，找到問題所在，自告奮勇，攀沿布幕升降繩索管道登高，想去調整纏結。重大的降幕石墜猝然下滑，幸而布幕管理人員及時控制，在距離我手掌寸許煞住，那人怒喝：「外行人不可以胡亂動手，剛才要是我沒煞住，你那隻手就斷了！」如果意外發生，何止我終身斷手，

「樑上君子」也無法演出。我飾演劇中戲份很重的角色夏律師，學校劇團哪會有替補演員的準備。戲不上演，已難交代，何況還有已售出的票如何處理？說到售票，也是發生與「樑上君子」相關的另一樁糗事。演出售票是配合一項募捐，我們不懂管控，有些同學代銷戲票，錢沒繳回。戲演完收支勉強相抵，沒多少錢可捐，已夠難堪，竟還收到通知要繳娛樂捐，大家傻眼。後來稅捐處通知校方，我身為社長被謝東閔院長召去面斥年輕人做事不負責任，但沒責令籌繳稅款，也不知如何結了案。我雖兩度挨訓，都衷心感謝，自覺經驗不足、思考不周，莽撞行事，傷己也會害人，深切引為後誡。又自嘲反思，也曾研讀過幾本劇團、舞台管理的書，怎沒這些方面的提示。我這少有社會接觸的大三學生，自作歸納：「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話似老套，實有至理。要找機會實地參與，只憑課堂和圖書館所得，不足以應對未來錯綜複雜的人生。

「戲劇之友社」的同學演員，後來真正投入影劇界的似乎只有大導演李行（子達），他從江蘇省立社會教育學院戲劇系轉入台灣師院教育系，是劇社後期社友，卻是主力演員而且兼任導演。其他同學女演員杜兆楠、劉其英入廣播界，田楨是田培林教授的女兒，男演員耿發揚是早期散文作家、後入聯合報任編輯。其他大都到學校任教。比較特殊的一位是鄭鴻溪，他是本省人，從大陸回來插班大二，入學不到一學期，就參加演出。在「離離草」劇中飾演我的祖父，一個樸厚慈藹的鄉村老農，他給同學的印象也是那般親和。一口道地的北方腔國語，比我純正得多。下一學期他就成為學生自治會中堅，「四六事件」他列在政府緝捕名單，人已失蹤。多年後，我在中央社大陸動態資料中，看到他已是大陸中央對台工作部門的副首長，料想他在台灣師院學生時，已為中共秘密工作。另一位「樑上君子」女主角音樂系一年級沈蘇斐，十分靈秀的女孩。大我一歲，在劇社好友中，自居是我的三姐（我在師院第一屆同學中，年紀最小，熟悉的低班同學戲稱我「學長老弟」，劇社的大哥大姐們，喊我「社長小弟」）。沈蘇斐來台幾個月，就在師院演戲當女主角，又加入台大「麥浪歌劇團」，是「麥浪」的重要歌舞演員，還兼邊疆歌舞助理指導。她在師院和台大都有一名護花使者，她不即不離、一視同仁，我們旁觀者清，兩位當事人卻能相互默忍。「四六」整肅，她未被波及，學期末，國軍已在大陸節節敗退，兩岸斷離情勢明顯，她悄然向我們道別返鄉，不多幾年輾轉傳來消息，她在故鄉蘇州已是藝文界高級幹部。四十年後兩岸開放，她應邀來台和我們一些老友重聚，已是祖母級的文靜女士。相談中，提到早年因藝

文活動曾獲周恩來數度召見。我很想私下問她，在台師院讀書時，是否已加入共產黨，卻始終問不出口。

負責校內劇團我的確是社長又兼小弟，徵集社友、邀約演員、恭請導演、向校方報備申請補助是社長，刻鋼版蠟紙、印劇本、借道具、協助釘佈景是小弟。雜務演戲之外，我竟還申請到校內文化走廊的空間，獨力編製出三期壁報，自編、自撰、自己寫、畫。報名「劇友」，內容包括戲劇理論與常識、各校與社會戲劇活動，還有我化名自編的獨幕劇本。

在此前後，北部大中學校劇運開始活躍，我接觸到的是台大話劇社和台北女師劇團。台大的台柱農學院戴祝畚是戴君仁教授的女兒，其他幾位女同學有台靜農教授女兒台純懿、錢歌川教授女兒錢曼娜和周學普教授女兒周小姐，男同學有後來電視界元老李文中和李行二哥李子堅等。

學校劇團參與者的動機不同，有的是好出風頭、有的是藉機追求異性，但大多數是熱衷舞台演出。真正投入表演藝術的，多選與自己年齡性格生活背景相異的角色來考驗磨鍊演技，也算是另一種人生體驗。不過除了女師這樣純收女生的學校，除非是劇情安排，話劇不鼓勵男扮女，女扮男，有的男校校內演出話劇得向校外邀請女角。專挑英俊、美貌劇中人物才願扮演者，我們私下列為「非我族類」。我自己是遍試過老、中、青、少、奸、傻、粗、狂多種角色，深覺才算過足戲癮，李行更是如此。女生如師院的田楨、台大的戴祝畚都慣演反派。

校園演出，無名利負擔，演戲以自娛成分居多。早年校園演出，觀眾自由進出，沒發過入場券，沒有票房壓力。禮堂容量有限，在那媒體尚未活躍時代，免費看戲的客源不缺。演員也沒什麼聲望可期，粉絲現象還沒萌芽。報紙連「新中國劇社」來台演出「鄭成功」，也只在內版給個一欄標題，報導中列出柯遠芬、黃朝琴、游彌堅、葉明勳等十多個演出顧問大名，劇團只提到「名導演家」歐陽予倩。新生報標題還把劇名「鄭成功」錯成「鄭功成」。學校劇團，哪有新聞報導機會。

現場掌聲，演出後例行檢討時、導演或參演同學間些許佳評，已是足夠的鼓勵。偶爾校園附近小朋友突然發現你，大叫出你曾扮演過的劇中人物名字，算是很大的驚喜。校內同學看戲並不踴躍，校園裡難得有人對你矚目，或許有些知情者還把你打入不務「學」業之流。

三十年代的台灣，物資非常缺乏，校方補助有限。學生演出，成人服裝都是向親長商借，不小心污染破損，也無力賠償、清洗，只有道歉了事。化妝多用眉筆、胭脂、口紅，化妝油彩是用繪畫顏料調配，打底、卸妝，買的是大盒藥用凡士林。似乎那時代女同學的皮膚較有耐性，很少有人抗議皮膚受損。記得李行三十七年半途加入我們行列，化妝時自備一小盒高級卸妝品，我們情商沾一小指試用，細膩滑潤，羨慕不已，久後才知道是今日市場落伍多年的ponds。

各校都沒有合格舞台，師院支持「日出」上演，就原來禮堂講台前面延伸半個圓環，拆掉台上日治時代制式懸掛天皇照片的後壁

，深度不足。佈景用帆布木框景片，演出前動員勞作圖畫專修科同學塗畫背景，剛由日本回國插班寄讀勞圖科的楊英風是我們義務畫工之一。

舞台裝置、燈光、效果，都靠外力，主要支援者是董心銘領導的軍中演劇三隊。隊方的司徒陽為我們導演「離離草」，丁衣幫演員化妝，陳萬里（上官亮）督導佈景、道具安排，傅碧輝、曹健也和同學交流很多。

我在師院狂熱戲劇活動約在三十六年到三十八年，這段時期的台灣，經濟貧弱，政治氣氛外弛內張。雖然發生過二二八事件、大陸國共戰火瀰漫，台灣表面上還沒戒嚴法約制。學生時常罷課、遊行、示威，從南京來臺視察的教育部長朱家驊，為躲請願的師院學生，由後門閃走。議會言論肆無忌憚，王添燈以犀利馳名，郭國基大砲轟得台大校長傅斯年腦溢血猝逝。報紙雜誌雖說不上百家爭鳴，發行量甚小、但家數多，言論報導未受禁限。國外和大陸報刊大都准許進口，電影院放映過蘇俄影片因票房不佳後繼無力。圖書館可以借到馬克斯的「資本論」，魯迅、高爾基的小說，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我都是向師院圖書館借閱的。果戈里、陳白塵等的諷刺劇都曾上演，學校劇團選擇劇本幾乎從心所欲。

三十九年初以台廣朋友為班底在中山堂演出袁俊的「邊城故事」，因政府已禁用左派文人作品，改名「邊城曲」。動員很多演員，除了台聲關係的王玫、杜彤、李行等和我，還外邀電影界的唐菁、田豐，演員成分錯綜，有電影明星、廣播界客串和學校劇團成員。導演是後來聯合報的同仁楊文璞。這是那兩年台灣、也是我戲

劇生涯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演出。另一個未完成的校外戲劇活動，是我參加新生報副刊「橋」的詩歌朗誦活動，認識主編歌雷（史習枚），他和我商談排演田漢的獨幕劇「南歸」，作為一項大型活動的重點節目，演員已大致商定，他卻被捕，演出告吹。

三十八年「四六」學潮對學校劇運是個重大震盪，五月間我還向校方申請演出「雷雨」，新到任的課外活動組主任立刻找我面談。他笑瞇瞇地問我：「你知道政府剛頒布戒嚴令嗎？」我搖搖頭。他遞給我五月十九日台灣省政府和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布的台灣省戒嚴令，繼續笑著提示我，戒嚴後如果排演附匪作家的劇本是為匪張目，更不用說演出。事後我才打聽到這位新主任就是警總派下來的，我也後知後覺地發現過去我們常借閱過的左派作家作品和親左書局的出版品，都已從圖書館和書店的架上消失了。不幸的是我們想演的劇本，幾乎都被列入禁演名單，而且持續將近四十年。自此以後，除了改編外國劇本和少數抗戰題材作品，只能演出反共宣傳八股，我們沒合適劇本可選，校方對我們也轉冷淡，「戲劇之友社」也就此默默解散。

從「二二八」到「四六」前後，我認識的戲劇圈師友，包括劇社同學，動態變化很大。黃榮燦、白克被處死刑，蔡瑞月、歌雷入獄，雷石榆、司徒陽、陳大禹或逃或走，返回大陸，我交往的戲劇圈朋友逐漸減少。我於畢業前參加學校一次聯合公演，就脫離校內活動。李行晚我兩班，隨後那兩年他帶動的師院戲劇活動，出了白景瑞、劉芳剛、馬森、劉塞雲等名導演和藝文界菁英。

畢業後，我應聘臺南師範學校任教，校方欺生，教學之外還要我兼帶課外活動。曾任華視總經理的吳寶華，當時是南師訓導主任，他邀我指導南師學生劇團，時常巡迴到附近軍區勞軍演出。兩個出色學生演員：女生許瑛、男生趙森海，都有不少軍中粉絲。趙森海後來以趙菁化名，為中廣台南台主持節目，揚名後當選台南市議員。許瑛分發國小任教，似未繼續參加戲劇活動。

第二年我兼南師附小訓導主任指導學生兒童劇，演員之一是二十多年前曾任政戰學院院長的鄧祖琳，當時他是初小四年級學生，擔任的只是一大群龍套角色之一，八十年代相遇，他已記不得演過兒童劇了。女生中一個天才演員五年級學生鮑蓓光，後來畢業於政大新聞系、曾任中央日報記者。還有一個是薛岳將軍的小女兒薛敬國。兒童劇演員不等於影劇中的兒童演員，一般影劇中兒童要保持自然，兒童劇是提供小演員充分發揮想像與模擬，他們為表演的刻意做作，反更天真可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政壇怪傑沈富雄，我指導他演講，獲得全省國小冠軍，他天才橫溢，校長原想選他參加兒童劇演出，但因他已是六下學生，怕影響升學作罷。幾年前我曾戲問他：「你現在這樣的國語水準，當年怎會奪得全省第一名？」他自嘲長大後的活動圈不流行國語，就變調了。

下一年我轉任台南啟聰學校教導主任（影后歸亞雷曾在此校服務，是多年後的事）任教、校務之外，又沾上戲劇。為校慶導演教師合演的獨幕劇和歌劇，這兩場戲讓我結識貫串兩劇的女主角黃肇珩，除了導演、合演，還為她指導的學生啞劇「木偶奇遇記」助導。

我顯盡身手，拉近距離，經歷六年多長跑，直等到她升學師大畢業才步入結婚禮堂。早年啟聰校長白今愚以女方介紹人身分致詞，戲謔地引用當時上演不久 瑪麗蓮夢露主演電影「七年之癢」片名，喻述我們的戀愛過程，想來這應是我熱心學校劇運的最大收穫罷。當時為「木偶奇遇記」配樂，我選了比才的「卡門」歌劇序曲在劇中迴旋奏出。婚後每逢聽到這闕樂曲，我們都迴盪在心，默許它是我們牽手將近六十年的序曲。

肇珩辭離啟聰升學師大，她選社會教育系是目標招生簡章上的戲劇分組，但到二年級分組新聞取代戲劇，她喜愛寫作更甚戲劇欣然換上跑道。回溯過去的戲劇之友劉其英、杜兆楠、耿發揚、李行、李子堅、李文中、白景瑞、劉芳剛、楊文璞、杜彤、鮑蓓光、黃肇珩和我，離了舞台都當過記者，不得不承認戲劇與新聞頗具友緣。

重返台北不久，參加了師大校友慶祝校慶，和白景瑞、劉塞雲等同學合演由李行導演的獨幕劇，從此和舞台告別，甚至連話劇也很少看了。

手指敲出電腦螢幕上詞句，腦海卻湧現歐洲攝製「彼得與狼」劇情片的場景：老祖父隔著玻璃面對窗外雪地，幻憶出青春年代的鱗鱗爪爪，眼前迷朦，脫下眼鏡、紅著眼眶嘴角微翹。我也迷朦，我從彼得老祖父感傷與溫馨交織的迷朦，更深浸入我自己戲劇與人生的迷朦。他在演戲，我迴夢於真實的人生。



微風拂過浪花綿

——見證國語廣播劇及電視劇在台灣起步

七十多年來，廣播和電視滋潤台灣普遍大眾精神生活，其中融和語言和慣俗居功最偉的是戲劇節目，而最先領風騷的是國語廣播劇。

白虎冤獄、淒艷訣別、惡差虐辱、野豬林深、英雄末路、悲憤詰天、怒僧獅吼、奸吏陷害、火焚糧場、逼上梁山。

約摸二三十坪的一個播音間，四男一女圍繞著橢圓長桌，各持一份油印劇本，輪流發出十種以上不同角色的聲音，分別敲打或揮動形形色色的代用道具，摹擬出各種劇中情境聲音，其中一位白髮老者邊演自己的角色、再不時以多樣手勢指揮另四名演員，和披頭散髮在長桌另一端伏案操作唱片的配音員。沒有錄音設備，一切現場即時播出。

這是民國三十六年歲末，五個演員在台灣廣播電台試播了自編自導的「林沖夜奔」，就此揭開國語廣播劇在台灣播出的序幕。

飾演白髮長者的林楓葦和演員之一的姚加凌，是台北高級中學國文老師，女演員林慧英是林老先生女兒，她和我都是省立台灣師範學院二年級學生，另一位演員陳小潭在電台負責平劇節目，配音員張白帆。

我主演花和尚魯智深，戲分頗多，要粗獷雄渾聲音、而且時須大吼大喝，一場戲播完，我真有聲嘶力竭之感。收場後，門一打開，一位女士隨即進入，掃視我們在場五人，笑問：「哪位是魯智深？」陳小潭指我，她笑不可抑，連連指點著我：「竟然是你！？」小潭介紹她是來值班播音的靳佩芬小姐（筆名羅蘭）。她解說，分辨我們在場四位男士：林先生年長、加凌清瘦、小潭溫文、我最年少，實在想不出誰能發出花和尚魯智深的吼聲？

說來我們這國語廣播劇開播的五名演員，是個有趣組合。論國語，林家父女微帶廣東腔，姚加凌鄉音略存，我這黑龍江的漢旗裔人，有些字音不同於標準國語，只有陳小潭道地閩南語系子弟，反倒是一口純正京腔。

當時台灣只此一家廣播電台，是接收日治時代設施，名義上隸屬南京中央廣播電台。設備有限，人員編制也少。但日本在戰爭後期因應需要大力推廣，台灣民眾收聽廣播已相當普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察覺廣播用於政令宣傳效果優於報紙雜誌，對台廣頗多支持。台廣在新聞音樂之外，先以台內同仁自力試播廣播小說，聽眾反應甚佳，決定進一步製播國語廣播劇。

在台長姚善輝、節目課長翁炳榮推動，電台工作人員配合之下，「林沖夜奔」順利播出，國語廣播劇從此正式納入台灣廣播節目序列。

那時相關人員及設施極度缺乏，除了我看不到的工程部門之外，配合我們的只有值班播音小姐和掌控音效的張白帆，所謂音效，只是一些硬碟音樂片，由他依照事先以粉筆注記的段落、適時

插配橋樂，其他劇情音效諸如風聲、雷雨聲、流水聲、馬蹄聲等等，都由我們這幾個演員分別用酒杯、大片洋鐵片等相關道具摹擬配出。

「林沖夜奔」試播通過，台廣把國語廣播劇納入節目正軌，半月一次。當時沒有一般錄音設備，只能現場播出，無法重播。

劇組工作分配，林姚二位輪流編導，資深播音員周謹予加入女主角行列，六人小組展開台灣國語廣播劇的先聲。當時台灣廣播電台除台北總台，另有台南、台中、花蓮、嘉義四個分台，台北總台在新公園東南角，現為二二八紀念館，前年偶過進去懷舊，還找到一樓的小小會客室，大播音間已不辨何在。

耕耘兩三個月，漸趨熟絡。全省大約有十多萬架收音機，並不知道收聽率如何？電台僅憑聽眾隨興的反應，估測收聽趨向。依我今日的回憶料算，收音機不多、慣聽國語廣播的人數也有限，但電台必須推動自製國語節目，已起步的國語廣播劇列為支持重點。我在師院已組成了戲劇之友社，先後引介同學杜兆楠、李行（子達）、林佩蘭等加盟台廣。

台廣編制也獲擴增，男女播音員加多，決定成立「台聲劇團」，延攬台內外有戲劇經驗人士，每半月播出大型廣播劇一次，另開闢一週兩次的「小說廣播劇」。我因原始草創又相對資深，被聘為特約編導和基本演員。

當時在台灣實施戒嚴法之前，內容題材並無明顯限制，電台在戲劇節目方面重點在推廣傳統文化和培養國語聽眾。我們播出的小說廣播劇大多改編今古奇觀、民間故事或元人雜劇、彈詞小說、平

劇以及歌仔戲。大型廣播劇則改編話劇劇本，囊括中外，曹禺、歐陽予倩、洪深、田漢、袁俊、夏衍、李健吾、吳祖光、易卜生、歐亨利、果戈理、契柯夫甚至沙士比亞作品都曾改編過。

記憶中規模較大的兩部戲，「清宮外史」和「家」，都是分四次播出，每周一次，一個月播完。

「清宮外史」改編自楊村彬劇本，重要演員：慈禧周謹予、光緒惠依涵、珍妃王玫、瑾妃杜兆楠、李鴻章李行、李蓮英姚加凌、寇連材馬驥伸。「家」由我混合巴金原著小說和曹禺改編的話劇劇本重編成廣播劇，重要演員覺新李行、覺民李子堅（李行二哥台大話劇社員）、覺慧馬驥伸、祖母周謹予、瑞鈺杜兆楠、梅表姐郝春萍（師院戲劇之友社員）。

所有播出的是現場，參與演出者都沒聽過自己的成品，效果如何只有聽眾零星拉雜的反應，連我家人因配合不上播出時間，似乎都沒收聽過幾次。記憶中的一次聽眾反應，是我和李行合作的一檔小說廣播劇「謫仙李太白」，李行分到遠祖李太白，我則過過唐玄宗的皇帝癮。播後第二天，遇到師院社友大姊郝春萍、小妹吳漪曼，她們齊聲稱我「小老馬陛下」，讓我得意一番。吳小妹那時是垂著雙辮的嫩丫頭，出國深造，二十多年之後回台灣，成為師大鋼琴名教授。

這一段廣播劇活動大致在民國三十七、八年間，這兩年是台灣光復後變化最大的階段，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單純到複雜，從赤貧匱乏到艱困克難。

就我個人生活周遭所及，應聘台廣特約人員每月可領固定津貼最高紀錄是一百六十萬元，新台幣改制，變成四十元。一年後，我師院畢業到台南師範任教月薪新台幣二百元。舊台幣的瘋狂貶值，可想見市場與大眾生活的動盪和混亂。

台廣給我唯一特殊待遇，是吉普車接送，那時台北市街頭難得看到幾部轎車，大一時，師院院長李季谷的官車是人力車，大二時，師院校內文化走廊一幅漫畫，諷刺台大一位院長在公配的三輪車背後，漆書台大文學院長姓名，標題是「風頭出盡三輪尾」。所以起初幾次吉普車在我家門口鳴喇叭，惹得四周鄰舍伸頭探看。那部吉普車是台廣接送換班同仁的通勤車，台廣員工宿舍離我家不遠，順帶接我送我。那一兩年，我每周兩到三次搭這部吉普穿越仁愛路台廣員工宿舍，一排排獨棟日式矮屋，附近一片水田，絕難想像今日發展成豪宅象徵的「帝寶華廈」。

台灣光復頭兩年，大陸國共內戰，無暇無力也無心顧及台灣，戰時的殘毀、戰後的凋敝，加上中國大陸本身的混亂，台灣一直陷在艱困匱乏窘境。民生貧苦、藝文活動更是慘淡，台北兩、三家電影院放映陳年老片，能懂國語和中文字幕的又少，一天兩三場，觀眾很少過百。歌仔戲沒有經常的檔期，永樂戲院的平劇在三十七年底才開始。收音機則因日僑遺留下不少，廣播收聽免費，一時成了最普遍的大眾娛樂通道，包括音樂、歌仔戲、宋非我的閩南語話劇等等。國語廣播劇和廣播小說開播初期，受語言障礙，聽眾不多，我們這些演員在播音室聲嘶力竭地大喊大叫、狂哭狂笑，在當時的

社會上近乎默默無聞。只有一張半版面的報紙，每天刊出台廣節目時間表上，有一行當日的廣播劇或小說廣播劇劇目。我不知道國語廣播劇開播或台聲廣播劇團成立有沒有新聞見報，但似乎我們這一群組最

先見報的卻是我們的配音大師張白帆，他是以陳素卿淡水殉情案男主角大大揚名。另一位周瑾予，是在赴美十多年後，因丈夫涉及國際間諜案連帶見報。王玫則因寬容婚姻第三者劉立立，數十年來偶或被媒體報導。李行在電影界自己縱橫導演天下。靳佩芬退出廣播圈後，以羅蘭筆名享譽文壇。翁炳榮中廣總公司遷台併納台廣後，調任中廣駐日代表，十多年後回台，出任中視節目部經理，但他經常是以翁倩玉之父現於新聞。林楓葦是世家中醫，台北高級中學廢校後，他掛牌開業，經常在自己的執業廣告上出現報端。林慧英畢業後任教北一女，今日七十歲以上的綠衣校友有可能被她教過，但她們一定想像不到這位嬌小纖秀的林老師，曾在廣播劇中演過叱吒萬軍之中的梁紅玉。

中國廣播公司接收台灣廣播電台，這一段國語廣播劇播出紀錄逐漸淡化，在廣播史上似乎未見提及。但我們這一群組披荊開路的先頭部隊嘶吼起的微風，至少拂出國語廣播劇的浪花，大時代洪濤中誰理會到浪花一現，對我們當事人卻是記憶綿深。

我於民國三十九年師院畢業任教台南師範，離開台北也退出廣播圈。不久國民政府遷台，大量國語聽眾湧入，廣播聲勢大增。我以前從沒有機會在收音機上聽過自己編導和演播的廣播劇，此時倒變成熱心的聽眾。

再度接觸廣播劇，是我回台北成功中學任教，廣播邁入鼎盛時期。成功同事趙剛（正我）轉職中廣，為崔小萍炒紅的廣播劇組廣攬劇本，找上了我。洽商後我答允以徐志摩、陸小曼多變情史編寫劇本，寫作大綱提出後，巧逢徐志摩前女友林徽因和其夫梁思成被中共表揚新聞發佈，中廣當局認為徐志摩已列政治敏感人物，不宜作為廣播劇題材，重作新議，我因有其他生涯規劃，決心婉辭。

籌編徐陸劇本，有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插曲，我為博蒐大詩人相關風評，向我成功中學的大詩人同事紀弦請教，紀大師本名路逾，在成功任教國文，他有一堂課和我隔鄰，幾乎每次都在講書間，來一段痛斥學生的獅子吼，連我這邊的學生也受干擾，失神竊笑。紀大詩人聽我提到徐志摩，以低沉肯定的語氣笑答：「我最看不起他」，大詩人那清瞿的苦禪臉上，綻現的似笑非笑似不屑非不屑，至今猶未磨滅。

在廣播劇鼎盛時期和它揮別，不多幾年又被電視劇沾上。我辭中學教職進修新聞傳播後轉入另一跑道，竟又是一個初創事業。到剛成立不久的教育電視台負責新聞部門，此台情況頗似當年的台廣，編制極小，只我一個組長兼記者再兼主播，外加半個女播音員，包辦所有新聞播報及特寫節目，設備簡陋。較晚成立的台灣電視台也是草創初期，各方面就緒不足。所以台灣最早的電視劇先從教育電視台亮相，當然一切非常原始，全部棚內製作，現場播出，等於是舞台劇透過電視頻道傳送。不過台灣第一波電視劇演員都是由這裡起步，他們主要來自軍中演劇隊和國立劇專校友：諸如劉明、朱磊，包括後來轉成國際紅歌星的歐陽菲菲。

我主管新聞不涉戲劇，卻在一次台慶同仁自製節目被拖下水，那一場電視劇由節目部主任廖祥雄導演兼導播，兩個導播李英、陳小凌和女播音員盛寶婷轉為演員，我是編劇兼演員，余秉中是美術設計兼舞台裝置。可笑的是如今連我自己編劇的劇名都忘記了。這場意外插曲，幾年後讓我和電視劇又結了一劇緣。

五十年代末期，台灣電視已進入三家爭霸之勢，教育電視台老同事各奔一方，廖祥雄接台視節目部經理，余秉中、李英分別被中視、華視延攬為導播，我則到中央通訊社繼續新聞本業。電視劇已成大眾不可一日或缺的娛樂，三台劇烈競爭，劇本供不應求。老友余秉中邀我為中視編劇，業餘寫作。我答應下來，選了荊軻刺秦王主題，對岸正高唱批孔揚秦，這類歷史劇應時應景。無巧不巧，我已送出編劇大綱，傳來蔣經國在美國遇刺消息，荊軻刺秦變成敏感話題，此刻誰敢觸及，我的劇本當然擱筆。

不久，老長官翁炳榮回國接任中視節目部經理，中視一檔「長白山上」，收視率衝高，策劃以更多連續劇接力。余秉中又邀我加入一個編劇小組，同工四人王鼎鈞、吳東權、黃家燕、馬驥伸。中視派出編審董舜，負責聯絡協助。初步議定以鄉村青年進入都市努力奮鬥掙扎出頭過程為中心題材，是中視第一部嘗試現代寫實生活的國語連續劇，取名「鳳凰樹」。

四個編劇中，兩位名作家王鼎鈞出身中廣、吳東權來自中製，另一位黃家燕後來加盟華視，我已離開教視轉職中央通訊社。大家都是電視編劇新手，當時先進也不過多兩三年經驗，大家所憑賴的

是話劇、廣播劇、電影劇本再參酌小說、平劇、閩南戲的各類技法揉合運用。

聯合編劇的過程是先聚會幾次，議定劇情發展大綱、中心人物定型，然後細部討論諸如主要角色的性格變化、語言習慣，以及劇情進行中各段落的起伏、懸宕，不同環境的設計安排等等。

正式進入劇本編寫是兩周聚會一次，商討十二次單元的主要劇情，分交每人執筆連續三天的部份。就十二個單元不分彼此，充分提供素材和建議，由董舜詳細記錄油印後，交大家帶回參考，至於如何把這不多幾頁的紀錄發展成三個一小時的單元劇本，那就由我們四人各自發揮了。

寫好的劇本還可以在繼續聚會時過目一番，如有重大異議尚可討論修正，但到「鳳凰樹」上檔播出，導演已在催搶劇本，我們到手的上次劇本只是供續寫參考，原本已轉交排演作業我們已無權修改。

每兩週四人小組聚會一次，大約是一個工作天，上午十點開始，一點鐘午飯加休息，兩點繼續，六點晚飯後還要一小時核定當天的記錄。編審董舜全程陪同，掌控時間毫不放鬆，聚會地點是西門圓環附近一家小旅館，二三十坪的小套房。討論方式輕鬆自由，或坐沙發或躺床上、忽而繞室踱步、時或斜倚窗沿，隨機發言、集思廣益，我和鼎鈞、東權相識已久，家燕和他倆也是舊交，意見充分發揮，結果服從多數。董舜一旁振筆疾書詳盡記錄，也不時就電視專業角度插言。

聯合編劇主要是搶時間，也壯大聲勢，分工編寫難免不協脫節，全由導演處理。至於連續多久，是依據收視情況決定，反應好就得延長故事，不佳則限期結尾。幾個月的業餘編劇，我們只隔一兩週在那小旅館聚商劇情發展一次，從未見過導演和演員，也沒到過電視台現場。我因播出時間和本職工作時間相撞，竟然一次實播，都沒看過。

「鳳凰樹」一共播出四十二集，收視率紀錄中平，中視內部檢討是演員太新，號召力不夠。我個人看法，平實的現實題材吸引不了當時的一般電視觀眾，或許我們這四個編劇也過於文藝創作取向。

「鳳凰樹」無意中為台灣電視界挺出一個名歌星，劇中有個混血女孩，星探到文化學院發掘一個在學女生，戲份不多，上鏡亮麗，中視後來把她轉到歌唱節目，青雲直上成為熠熠紅星甄妮。

幾個月後，偶然遇見以「長白山上」當紅中視的王生善導演，他悄悄問我：「你得罪過什麼人？中視高層封殺你繼續編劇？」我一頭霧水，也不太在意。過了一陣，獲知真相。「鳳凰樹」播出期間，我們四個編劇本名天天出現螢幕，我似乎沒收到過親友的祝賀，卻被我任職的最高主管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注意到了，他可能認為我這剛到任不久的部室主管太深投入編劇，會影響本職工作，向他的學生中視總經理黎世芬表示關切，黎老總體會老師心意，下令作此決定，我的電視編劇插曲到此為止。

幾年後，我轉任教職，黎總也早卸任，余秉中已是中視資深當紅導播，享有「老魚頭」的美號，他還不死心又要我抽空加入他的

編劇陣營，我仔細考量自己實不適合電視編劇，而且電視編劇不同於話劇劇本不是個人的獨力創作，婉謝了秉中的美意。

一晃幾十年，我的廣播劇和電視劇經歷，只留下一本民國三十八年台廣「台聲劇團」成立紀念的日記簿，和兩厚冊油印精裝的民國五十九年「鳳凰樹」劇本。

七十多年前，參加編導演出兩百次以上的小說廣播劇、近百次大型廣播劇，我從沒有在頻道上聽過。半世紀前自己編寫的電視劇在螢幕上播出，我也從沒有看過。偶爾在記憶中浮現的浪花是那些合作夥伴的聲音笑貌，林楓葦的仙風道貌、陳小潭的溫文敦厚、張白帆的頹廢披頭、靳珮芬的臨門笑話、李子達的渾厚台詞、杜兆楠的巧笑倩音、王玫的爽朗親切，續後到王鼎鈞的溫言深致、吳東權的俏語漫談、董舜的無微不至，當然最難忘的是紀弦似嘲似諷和老魚頭余秉中殷殷邀約的兩種寓意迥然的笑容。